明代研究 第四十期 2023年6月, 頁73-116

DOI: 10.53106/160759942023060040003

晚明遼東「横江」考*

馬 驥**

日本學者稻葉岩吉最早指出鴨綠江的支流渾江在明代有「橫江」之名,但這一觀點從未得到證實。本文通過爬梳熊廷弼〈勘覆地界疏〉、《狀啟謄錄》等文獻的記載可知,該觀點是成立的。橫江還從河流名稱引申為區域名稱。直到成化朝(1465-1487)為止,明朝官方只是對朝鮮王朝(1392-1919)用以稱呼渾江的「婆豬江」地名稍有了解,此後長期對渾江缺乏認知。萬曆三十六、三十七年(1608、1609)間,熊廷弼在遼東的勘界調查,使「橫江」一名得以廣泛傳佈。明末遼東戰事爆發後,明朝不少官僚士人都重視橫江的軍事地理價值。但隨著明亡清興,以及這一歷史進程中的邊疆人群瓦解,流域封禁,「橫江」不再見諸文獻記載,失去作為官方地名的機會。

關鍵詞:寬奠、朝鮮王朝、横江、渾江、鴨綠江

^{*}本文初稿曾在2021年12月4-5日,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舉辦的「第二屆全國歷史地理學研究生聯席會暨第五屆禹貢青年沙龍年度會議」上報告,得到與會師友評議。本文寫作修改過程中,在釋讀朝鮮王朝史料和韓文文獻方面,得到了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珠海)張澍博士後和廣州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朱玖副教授的幫助;在製作歷史地圖方面,得到了導師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珠海)吳滔教授和同系李大海副教授的指點;並承蒙三位匿名審查人給出的寶貴意見。在此一併致謝。

^{**}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 (珠海) 博士生; Email: maji6@mail2.sysu.edu.cn。

研究者一般認為,鴨綠江的支流渾江在明代的漢文名稱是婆豬江,在清代的漢文名稱是佟家江。¹這兩個河流名稱應該都有非漢語言的背景,還有不少其他漢字音譯形式。²不過,此地名的源流應要更為複雜。有關明代渾江的漢文名稱,1913年日本學者稻葉岩吉(1876-1940)就指出渾江在明代又稱橫江。³此後,多有學者採信這一觀點,卻無實證研究。本文將證實這個觀點,指出晚明時期遼東的橫江從河流名稱引申為區域名稱,並對該地名在明清、朝鮮相關文獻中出現和消失的歷史背景做分析。

一、既有的「横江即渾江」說缺乏論證

萬曆元年(1573)至四年(1576),明朝在遼東東南部地區拓展邊界,修築 寬奠等六個城堡。⁴萬曆十三(1585)、十四年(1586)起,明朝政府允許民眾在

¹ 例如: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就標明了婆豬江和佟家江。參見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冊 7,頁 82-83;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冊 8,頁 10-11、12-13。清朝和朝鮮王朝的諸多文字和地圖材料清楚地表明了婆豬江、佟家江、渾江之間的對應關係,以致於研究者似乎並未專門梳理過相關史料依據。本文在此不作贅述,只列舉兩條簡明扼要的史料供參考:「佟家江亦出長嶺之西,入於鴨綠,所謂婆豬也。」見〔朝〕李瀷,《星湖先生文集》(首爾:景仁文化社,1999),卷 15,〈答安百順問目〉,頁 120;「佟家江,亦曰渾江。」,見〔清〕托津等奉敕纂,〔嘉慶〕《欽定大清會典》(臺北:文海出版社,1991),卷 10,〈户部・尚書侍郎職掌一〉,頁 436。

² 婆豬江又可寫做潑豬江、婆提江、蒲洲江等形式,佟家江又可寫做佟佳江、通加江、通吉雅江等形式。[朝]丁若鏞,《與猶堂全書》(新北:漢棠文書股份有限公司,2017),集6卷6,〈大東水經其二·綠水三·鹽難水〉,頁107-109;[清]阿桂、于敏中等奉敕撰,《欽定滿洲源流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卷15,〈山川二·佟佳江〉,頁690-691。

³ 稻葉岩吉,〈明代遼東の邊牆〉,收入白鳥庫吉監修,松井等、箭內亙、稻葉岩吉撰,《滿洲歷史地理》(東京: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1913),卷2,頁536。

⁴ 六堡分別為寬奠、長奠、大奠、永奠、新奠、孤山新堡。有關此次拓邊築堡的過程和寬奠六堡的分佈格局、邊防地位,參閱和田清,〈明末に於ける鴨綠江方面の開拓〉,收入和田清,《東亞史研究(滿洲篇)》(東京:東洋文庫,1955),頁 514-521 (原刊於《史學雜誌》,30:9-12 [1919]);孫祖繩,〈明代之寬甸六堡與遼東邊患〉,《東北集刊》,3(1942),頁6b-14b;邸富生、盧驊,〈略論明代萬曆年間寬奠六堡的移建〉,收入吉林省東北史研究會編,《東北史研究》(長春:吉林省東北史研究會,1983),輯1,頁98-104。本文關注的晚明遼東東邊基本地理概況,均可參看第三節末所附「圖6晚明遼東東邊簡明示意圖」。

新的邊防線外圍開墾定居,⁵邊民向東開拓出了面積可觀的寬奠新疆。⁶然而,到萬曆三十一年(1603)至三十四年(1606),明朝遼東總兵李成梁(1526-1614)會同薊遼總督蹇達(1542-1608)、遼東巡撫趙楫(1546-?),選擇棄守寬奠新疆,強制遷回當地居民。⁷萬曆三十六、三十七年間,遼東巡按熊廷弼(1569-1625)對棄地後果進行了調查,並上奏〈勘覆地界疏〉,⁸從中可知,「五奠邊外」的大片土地已被放棄,⁹居民已被驅離:

自靉陽迤東,新奠、寬奠、大奠、永奠、長奠等處,至鴨緑江邊,原係巡撫張學顏、總兵李成梁所創一路,墩台邊界俱存。即界外近地,如雲頭里、哵咧泊、剪子河、松子嶺幾處,尚聽住種。惟自靉陽界,起賽兒疙疸,迤東至橫江一帶,共計地名四十餘處,住民四千三百二十餘家,沿長近三百里,皆在鴨緑江西岸,土人稱系朝鮮餘地,俱經二十五、六、九等年,委官何繼祖等,公同夷人刻木鐫石立界,俱被韓宗功驅逐入境。……但自靉陽界,起賽兒疙疸,迤東至橫江一帶,徑一二百里,長約三百里,住民耕種已久……。10

熊廷弼所言遼東巡撫張學顏(?-1598)、遼東總兵李成梁「所創一路」應指

⁵ 和田清、〈明末に於ける鴨綠江方面の開拓〉,頁 523-524。

⁶ 孫祖繩指出,萬曆初年開拓的寬奠六堡相對於舊邊來說是新疆,而此後在寬奠六堡 境外開拓的土地相對六堡來說也是新疆,並稱明清文獻中的寬奠新疆「乃寬甸界外 之新疆,非指寬甸為新疆也」。參見孫祖繩、(明代之寬甸六堡與遼東邊患),頁 16b-17a。孫祖繩引述了《東夷考略》的記載作為論據。其完整表述如下:「(萬曆)三十 三年,李成梁再出鎮,則議徙寬奠新疆民六萬餘入内地,弃新疆爲甌脫。」見〔明〕 茅瑞徵,《東夷考略》(上海:上海精華印刷公司,1941),〈女直通考〉,頁 12b。 〔明〕熊廷弼,《按遼疏稿》(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2,⟨勘覆地界疏⟩, 頁 399、400、401、404-405、408; [明] 劉若愚著,馮寶琳點校,《酌中志》(北 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卷21,〈遼左棄地〉,頁186-187;[明]顧秉謙等奉 敕撰,《明神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卷 424,萬曆 三十四年八月癸亥條,頁 8014;不著撰人,《萬曆邸鈔》(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 印社,1991),萬曆三十四年丙午卷八月條,頁 1381-1382。按:孫祖繩的研究表 明,儘管明清文獻多將此次棄地事件係於萬曆三十三(1605)、三十四年,但其動 議時間可追溯至萬曆三十一年。棄地範圍除寬奠六堡外圍地區(「五奠堡」以東地 區、孤山新堡外圍的張其哈喇佃子)外,還包括馬根單堡、一堵墻堡、鹻場堡等處 的外圍開墾地。相關研究參閱和田清,〈明末に於ける鴨綠江方面の開拓〉,頁 529-535; 孫祖繩,〈明代之寬甸六堡與遼東邊患〉,頁 14b-19b。

^{8 「}明〕熊廷弼,《按遼疏稿》, 卷2, 〈勘覆地界疏〉, 頁397-411。

^{9 [}明]熊廷弼,《按遼疏稿》,卷2,〈勘覆地界疏〉,頁402。

^{10 [}明]熊廷弼,《按遼疏稿》,卷2,〈勘覆地界疏〉,頁400、403。

寬奠參將防區,包括熊氏列舉的五個城堡。¹¹熊廷弼稱此路防區有明確的墩台邊界,當時僅有少數界外近地還允許民眾住種。他指出,在明朝遼東當局選擇棄地之前,大批明朝民眾曾在墩台邊界以外廣泛地耕種居住,沿鴨綠江右岸向東開拓了大片土地。整片沿江拓展地從靉陽地界的賽兒疙瘩向東綿延近三百里,¹²直到橫江,其北面縱深也有一、二百里。現存明代文獻中,正是熊氏的這份題本首次提到了「橫江」。天啟二年(1622),熊廷弼寫詩回顧當年的遼東勘邊經歷時,有「是為戊申冬,衝雪促晨裝;單騎出撫順,深入抵鹻廠;犬牙錯回互,迤東一江橫」的描述。¹³由此可以判斷,橫江是一條河流的名稱。那麼,橫江究竟流經何地,對應今天的哪條河道呢?

早在明朝末年,熊廷弼提到的「横江」就已被繪入程開祜(生卒不詳)所輯《籌遼碩畫》與兵部職方司主事陳組綬(?-1637)主持編纂的《皇明職方地圖》收錄的遼東地圖中(見圖1、圖2)。¹⁴遺憾的是,這兩幅地圖的排布扭曲難解。明朝遼東東邊以外的廣大區域被擠壓在有限的圖幅中,其中的地名信息在分佈方位上與邊內很不協調。研究者據此只能獲知「横江」大概位於明朝遼東東邊地帶,疑似是鴨綠江的一條支流,而無法對其地理位置進行更確切的定位。此外,陳組綬在談及遼東河流的概況時,稱「川,東帶鹽難,北涉遼水,西有二凌六州,而南逾横江,盡于渤海」,並且把「横江」和「鹽難江」並列

^{11 [}明]顧養謙,《冲菴顧先生撫遼奏議》(濟南:齊魯書社,1996),卷6,〈全鎮圖說〉,「兵寡」,頁478-479。除了熊氏提到的新奠等五堡外,孤山新堡屬於遼陽副總兵麾下清河守備所轄。新奠等五堡相互距離較近,均位於今遼寧省寬奠縣境內,而孤山新堡的位置相對靠北,在今遼寧省本溪满族自治縣境內。另,明代中後期,參將多任分守之職,分守一路防區。參見[明]顧養謙,《冲菴顧先生撫遼奏議》,卷6,〈全鎮圖說〉,「兵寡」,頁477-478;邸富生、盧驊,〈略論明代萬曆年間寬奠六堡的移建〉,頁100-101;肖立軍,《明代省鎮營兵制與地方秩序》(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頁219-220。

¹² 靉陽堡界鄰遼東邊墻,也屬於寬奠參將的轄區,位於熊氏列舉五堡的西北方向,相對於孤山新堡距離五堡更近。[明]顧養謙,《冲菴顧先生撫遼奏議》,卷6,〈全鎮圖說〉,「兵寨」,頁478。

^{13 [}明]熊廷弼,《熊襄愍公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卷10,〈壬 戊除夕寄示珪璧琮三男〉,頁316。

¹⁴ 這兩幅地圖中的「橫江」地名均與「賽兒疽疙」這一罕見小地名相伴出現,可見圖中的「橫江」明顯與熊廷弼〈勘覆地界疏〉中的「橫江」相一致。熊氏的題本可能就是兩幅地圖的信息源之一。

為遼東「邊夷駐牧」的重要地點。¹⁵他認為鴨綠江即「漢鹽難江,今曰鴨綠江,音轉也」。¹⁶這說明陳組綬明確將橫江視作鴨綠江以外遼東的另一條主要河流。但是,陳氏提供的上述文字信息同樣零碎含混,難以據此展開進一步的考證。

15 〔明〕陳組綬,《皇明職方地圖》(巴黎: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藏,崇禎八(1635) 至九年(1636)長安舫齋刻本),卷中,〈遼東舊邊形勢〉、〈遼東邊鎮表〉,頁「邊鎮 十五」b、「邊鎮十七」a。

^{16 [}明]陳組綬,《皇明職方地圖》,卷中,〈全遼邊圖〉,頁「邊鎮十四」b。

・78・馬 驥 明代研究 第四十期



圖 1 程開祜輯,《籌遼碩畫》所收〈遼東圖〉局部

資料來源:翻拍自〔明〕程開祜輯,《籌遼碩畫》,(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頁「圖一」b。



圖 2 陳組綬,《皇明職方地圖》所收〈全遼邊圖〉局部

資料來源:翻拍自〔明〕陳組綬,《皇明職方地圖》(巴黎: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藏,崇禎八(1635)至九年(1636)長安舫齋刻本),卷中,〈全遼邊圖〉,頁「邊鎮十四」b。

到 1913 年,稻葉岩吉提出,在明代佟家江名作婆豬江,又名橫江。¹⁷他 顯然讀到了記述熊廷弼勘界之事的文獻,因此認為萬曆時期明朝遼東東邊拓 展到了佟家江右岸,該河流是遼東「東邊之極限」。¹⁸不過,稻葉岩吉沒有提 供任何論據。1919 年,和田清(1890-1963) 在論文中指出橫江即佟家江。¹⁹1942 年,孫祖繩在論文中指出「婆豬江亦稱横江,今為佟佳江」。²⁰他們同樣沒有 論證橫江即佟家江。此二人的論文均與稻葉岩吉的研究成果有對話,其觀點 顯然因襲自稻葉氏。²¹此後,一些涉及明代遼東史地的著作又迭相採納了「橫江即渾江說」。²²然而,還是沒有人對其進行論證。

還有學者注意到了另外的史料系統。朝鮮王朝的《光海君日記》總共兩次提到鴨綠江流域的橫江,分別與薩爾滸之戰南路明鮮聯軍的戰前偵察和行軍有關。²³張其卓在研究薩爾滸之戰中明軍劉綎(1553-1619)部的行軍路線時,

¹⁷ 稻葉岩吉還將這一觀點寫入了他撰著的《清朝全史》。參見稻葉君山,《清朝全史》 (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社,1914),上卷,頁25。

¹⁸ 稻葉岩吉、〈明代遼東の邊牆〉,頁 533;稻葉君山、《清朝全史》,上卷,頁 25。稻葉岩吉可能參考的文獻包括《全邊略記》、《籌遼碩畫》、《皇明經世文編》等。這些明代文獻或多或少引述過熊廷弼的相關題本內容。不著撰人、〈引用書目解說〉,收入白鳥庫吉監修,箭內亙、稻葉岩吉、松井等撰、《滿洲歷史地理》(東京: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1913),卷1,頁32、38、39;稻葉岩吉、〈明代遼東の邊牆〉,頁531-536。

¹⁹ 和田清、〈明末に於ける鴨緑江方面の開拓〉,頁 531。

²⁰ 孫祖繩,〈明代之寬甸六堡與遼東邊患〉,頁 1b。

²¹ 和田清和孫祖繩都對稻葉岩吉所持萬曆後期明朝放棄了整個寬奠地區的觀點進行 了批判。參見和田清、〈明末に於ける鴨綠江方面の開拓〉,頁 529-535;孫祖繩, 〈明代之寬甸六堡與遼東邊患〉,頁 14b-19b。

²² 李健才,《明代東北》(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頁 190;叢佩遠,〈鎮守遼東總兵李成梁〉,收入董玉瑛、叢佩遠主編,《東北歷史名人傳(古代卷)》(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下冊,頁 143;佟冬主編,叢佩遠本卷著者,《中國東北史》(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卷3,頁 615;陳涴,〈努爾哈赤的福星和恩人——李成梁〉,收入顧奎相、楊路平主編,《遼海講壇》(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9),輯5,頁151;劉彥紅,〈本溪境內明代六大邊堡之——孤山新堡創築始末〉,收入遼寧省博物館編,《遼寧省博物館館刊(2010)》(瀋陽:遼海出版社,2010),頁 182;劉緯,〈張其哈喇甸子〉,收入張傑貴主編,政協本溪滿族自治縣委員會編,《女真崛起與本溪縣》(本溪:政協本溪滿族自治縣委員會,2015),頁 63。

^{23 《}光海君日記》中記載抄票欽差經畧遼東軍務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禦史楊鎬為邊務事:「今差百户于承恩前去寬奠、鎮江、昌城等處,踏看邊外地形及横江上水口路徑……。」見〔朝〕春秋館撰,鼎足山本《光海君日記》(首爾: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1933),卷 129,光海君十年(萬曆四十六年)六月辛未條,頁 13a。

舉出了《光海君日記》所載朝鮮軍隊都元帥姜弘立(1560-1627)馳啟中的語句「過涉横江,比鴨兒河深廣」,認為其中的横江指渾江。²⁴張玉興主編的《清朝前史》第二卷也徵引了這則史料,也認為橫江即渾江。²⁵然而,研究者們同樣沒有提供任何文獻依據。總之,既有的研究對晚明遼東橫江的地望只有判斷,沒有論證。

二、多重證據證實橫江即渾江

明清、朝鮮文獻對晚明遼東橫江的記載較為零散。不過,細究關鍵史料的內涵,可以從中發現證實「橫江即渾江」說的多重直接與間接證據。前人 徵引的熊廷弼〈勘覆地界疏〉和朝鮮王朝《光海君日記》恰好代表著不同方 向的考證突破口。

首先,熊廷弼的〈勘覆地界疏〉本身就隱藏著有助於本文論證的關鍵突破口,即熊氏將橫江視為寬奠新疆的東界。萬曆時期,明朝先後開拓、棄守寬奠新疆,直接導致遼東地區與朝鮮王朝的鴨綠江邊界長度有很大變動,這不能不引起朝鮮王朝官方的高度關注,因此相關的文獻記載也比較完備。宣祖三十三年(萬曆二十八年,1600)十一月,平安道觀察使徐渻(1558-1631)馳啟

又,都元帥姜弘立馳啟曰:「……大槩東路進兵,道路險遠,大川紫紆。今朝又將過涉横江,比鴨児河深廣,少有雨水,渡涉極難。鴨兒河凡四渡,深沒馬腹,水黑石大,人馬艱涉。」見〔朝〕春秋館撰,鼎足山本《光海君日記》,卷137,光海君十一年(萬曆四十七年)二月辛巳條,頁11b-12a。按:韓國的國譯《朝鮮王朝實錄》沒有把兩處「橫江」視為專有名詞,只是譯為單字「강」(江)。參見조선왕조실록(朝鮮王朝實錄),광해군일기[정초본]129권,광해10년6월14일辛未5번째기사1618년 명 만력(萬曆)46년:http://sillok.history.go.kr/id/wob_11006014_005,擷取日期:2021.4.30;조선왕조실록(朝鮮王朝實錄),광해군일기[정초본]137권,광해11년2월27일辛巳1번째기사 1619년 명만력(萬曆)47년:http://sillok.history.go.kr/id/wob_11102027_001,擷取日期:2021.4.30。感謝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珠海)張澍博士後幫助釋讀韓文文獻。

²⁴ 王明恩主編,張其卓執行主編兼撰述,《丹東滿族史略》(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 2006),頁 78。張其卓還認為熊廷弼提到的橫江指「長甸上河口」,但並未對此進 行論證。見張其卓,〈大清王朝發祥勝地丹東史話〉,《丹東日報》,2015年11月6日,第W02版。

²⁵ 朱誠如、白文煜主編,張玉興分冊主編,《清朝前史》(大連:遼寧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卷2,頁60。

稱:「仍念江邊一帶,自義州至于理山,隔江相望之地,唐人等築室墾田。」²⁶ 次年(1601)正月,平安道節度使李箕賔(1563-1625)馳啟稱:「目今唐人,列居江邊,始自義州,上至理山越邊,沿水作村,彌滿山谷。」²⁷同年十月,已任都承旨的徐渻有言:「且自義州至理山,沿江越邊,唐人之家連接,人家稠密處則築煙臺,少處則作門樓,懸鼓相為應變。」²⁸這些朝鮮邊臣的報告十分一致地提到了鴨綠江沿岸明朝人聚落的分佈範圍:從義州到理山的江對岸。義州位於鴨綠江的下游,距離入海口較近。理山對岸則是渾江注入鴨綠江的河口。²⁹可見當時鴨綠江右岸明人聚落的分佈範圍已經向上游有了更大幅度的擴展,明朝遼東都司和朝鮮王朝的鴨綠江邊界線也從入海口一直上溯到了渾江口。有意思的是,這些上言集中出現在宣祖三十三、三十四年(萬曆二十八、二十九年)間,正與熊廷弼所言「委官刻木鐫石立界」的年份十分接近,兩者可以互相印證。

大約十年後,鴨綠江邊界的新動向則與明朝棄守寬奠新疆的後果十分契合。光海君二年(萬曆三十八年,1610),朝鮮王朝的平安道暗行御史崔明(1563-1640)詳細報告了平安道鴨綠江沿岸鎮堡的守備情況。³⁰其中,廟洞堡位於昌城東北面十五朝鮮里,「隔江唐人盛居,有小堡,胡人亦居四十里之地,自此以上,唐人不居」。³¹據此可知,當時廟洞堡對岸大約可算明人聚落和女真人聚落的分界地帶。昌城距離鴨綠江對岸明朝的長奠堡、寬奠堡分別僅有

^{26 〔}朝〕春秋館撰,《朝鮮宣祖大王實錄》(首爾: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1931),卷 131,宣祖三十三年(萬曆二十八年)十一月丙辰條,頁 15a。

²⁷ 〔朝〕春秋館撰,《朝鮮宣祖大王實錄》,卷 133,宣祖三十四年(萬曆二十九年) 正月丙寅條,頁 32a。

²⁸ 〔朝〕春秋館撰,《朝鮮宣祖大王實錄》,卷 142,宣祖三十四年(萬曆二十九年) 十月癸未條,頁 7a。

^{29 《}東國輿地勝覽》記載:「(鴨綠江)至理山郡山羊會,與蒲州江[源出建州衛] 合。」見[朝]盧思慎、徐居正等編纂,李荇等增修,《東國輿地勝覽》(揚州:廣 陵書社,2019),卷53,〈義州牧·山川〉,頁241;又,《光海君日記》記載:「理山 正是婆猪江相對之地,不可不固守。」見[朝]春秋館撰,太白山本《光海君日記》 (首爾: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1931),卷129,光海君十年(萬曆四十六年)六 月丁卯條,頁39。

^{30 〔}朝〕崔晛,《訒齋先生文集·訒齋先生別集》(首爾:景仁文化社,1999),卷1, 〈沿江列堡〉,頁151-257;〔朝〕崔晛,《訒齋先生文集·訒齋先生年譜》,頁331。

^{31 〔}朝〕崔明,《訒齋先生文集·訒齋先生別集》, ※1,〈沿江列堡〉, 頁 168-169。

三十、七十朝鮮里。³²從長奠堡可以眺望到鴨綠江對岸的昌城。³³這說明寬奠 地區的明人沿江聚落已退縮至六堡附近。

經過以上這番梳理可知,萬曆時期,朝鮮王朝官員觀察到的鴨綠江右岸明人聚落分佈的演變與明朝寬奠地區東界的盈縮進程高度一致。這表明朝鮮王朝官員的相關報告頗為可靠,具有很高的史料互證價值。萬曆後期,明朝遼東的鴨綠江邊界一度向東拓展到了渾江口,與此同時,寬奠新疆也一度拓展到了「橫江一帶」。這一點一線相互印證,說明界河橫江就是渾江。直通鴨綠江幹流的渾江下游河道橫亙在前,構成了寬奠新疆的天然東界。

此外,明末張鼐(1572-1630)編纂的《遼夷略》能夠為熊廷弼描繪的圖景提供補證。萬曆四十八年(1620),張鼐以右諭德的身份奉命赴遼東等地發佈明朝孝端王皇后(?-1620)崩逝的訃告,在遼東巡撫周永春(1573-1639)那裡見到了「《全遼圖》底本」,之後得以編纂成《遼夷略》一書。³⁴因此,書中收錄的遼東地圖頗為值得關注。該地圖清楚地呈現了以下格局:在遼東邊塞、鴨綠江、鴨綠江西岸的一條大支流之間,夾著一片所謂「横江百里,地極肥饒」的土地,而這條大支流的基本流向與渾江頗為符合(見圖 3)。³⁵所謂「横江百

^{32 〔}朝〕春秋館撰,《朝鮮宣祖大王實錄》,卷 107,宣祖三十一年(萬曆二十六年) 十二月甲子條,頁 13a。

^{33 〔}朝〕李廷龜,《月沙先生文集·月沙先生別集》(首爾:景仁文化社,1999),卷 3,〈庚申燕行錄〉,頁376。

^{34 〔}明〕顧秉謙等奉敕撰、《明神宗實錄》、卷 593、萬曆四十八年四月己巳條、頁 11383; 〔明〕顧秉謙等奉敕撰、《明神宗實錄》、卷 594、萬曆四十八年五月丙戌條,頁 11392; 〔明〕張鼐、《寶日堂初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 30、〈使東日記並詩〉、頁 85-104; 〔明〕張鼐、《遼夷略》(上海:上海精華印刷公司,1941)、頁 1a-4a。

^{35 [}明]張鼐,《遼夷略》,頁 6a。這幅地圖之所以會在鴨綠江中標注「烏龍江」,並在支流上標注「此水來出烏龍江」,與明末時人誤認為溯鴨綠江而上可通烏龍江有關。萬曆末年後金大舉進攻遼東後,一些明朝官員基於這樣的認識,一度擔心後金在烏龍江打造戰船,威脅登萊一帶。參見[明]陳王庭,〈東省防禦厝處兵食疏〉,見[明]程開枯輯,《籌遼碩畫》,卷 27,〈已未仲秋一〉,頁 39a-39b;[明]王在晉,〈議固以防海運疏〉,收入[明]程開枯輯,《籌遼碩畫》,卷 27,頁 54b-55a;[明]周萬鎰、〈夷氛叵測廟算全疎疏〉,收入[明]程開枯輯,《籌遼碩畫》,卷 33,頁 29b。萬曆四十八年三月十四日,遼東經略熊廷弼為此專門詢問過出使明朝的朝鮮大臣李廷龜(1564-1635)。李廷龜書寫答案進呈給熊廷弼:「此兩江(即混同江和黑龍江[烏龍江])則在胡地深處,與鴨綠、豆滿相距絕遠。其間不知幾千里,重山疊嶺,絕無通船之路。降胡百隻船之言,無據甚矣。」由此可知鴨綠江和烏龍江是

里」,顯然是一種省稱,使人想到熊廷弼所言「迤東至橫江一帶,徑一二百里,長約三百里」的沿江新拓地。也就是說,這幅地圖用橫江這條河流命名了一個區域。它直觀地佐證了橫江即渾江的觀點,也說明橫江引申出了更多地名含義。



圖 3 張鼐《遼夷略》所收遼東地圖局部

資料來源:翻拍自〔明〕張鼐,《遼夷略》,上海:上海精華印刷公司,1941,頁 6a。

其次,朝鮮王朝文獻為本文從軍事地理視角解開「橫江」疑題提供了有力證據。韓國首爾大學奎章閣收藏有一部著錄名為《啓本謄錄》的寫本文獻,總共三冊,第一冊題為《狀啓謄錄》。韓國學者沈載祐(심재우)介紹稱,該冊抄錄了仁祖二年(天啟四年,1624)八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朝鮮王朝派

兩個相隔遙遠、互不相通的水系。熊廷弼閱後解除了心中的疑惑,感慨「頃有烏龍 江造船之說,俺本不信」。見〔朝〕李廷龜,《月沙先生文集·月沙先生別集》,卷3, 〈庚申燕行錄〉,頁375-376。

到黃海道和平安道防備後金侵擾,檢查邊備的御史上呈的狀啟,御史的姓名 不詳。³⁶其中,仁祖二年(天啟四年)十二月初三日狀啟有如下記錄:

承政院開訴。即接平安兵使鄭忠信馳報內。即刻到付,十一月三十日成貼,昌城府使金時若馳報內。當日,參將徐孤臣相見言內。都督票〔標〕下遊擊朱尚元差人自奴中來到,言曰……。又言:都督毛差一枝兵,由寬奠、靉陽、孤山以逼遼陽。又差一枝兵,由横江以逼奴酋老城。横江,所謂坡猪江。又差一枝兵,由鳳凰城、高嶺以逼海州。又檄差石城島兵,由峀巖進以逼盖州……詮次善啓云云。天啓四年十二月初三日。37

結合《朝鮮仁祖大王實錄》的記錄來看,平安兵使鄭忠信(1576-1636)似乎才是這份狀啟的上呈者。³⁸不過,狀啟引述的內容大體是清晰的。當年十一月三十日,明朝參將徐孤臣(生卒不詳)會見朝鮮王朝昌城府使金時若(?-1627)時,向後者轉述了游擊朱尚元(生卒不詳)轉達的情報,其中涉及毛文龍(1576-1629)部的軍事行動部署。朝鮮王朝的官員應該不太了解橫江這一河流名稱,所以徐孤臣在轉述時明確指出,橫江就是朝鮮人常常提到的婆豬江。婆豬江即今天的渾江。因此,狀啟中的橫江就是指渾江。

這份狀啟提供的證據不僅直擊要害,還揭示了渾江在明末遼東戰局中獨特的軍事地理價值。狀啟先提到「遼陽」,後又提到「奴酋老城」,後者應指晚明文獻多有提及的「老寨」。《明熹宗實錄》所錄奏疏,多將努爾哈赤(1559-

^{36 《}啓本謄錄》(首爾:韓國首爾大學奎章閣藏,1943 年後寫,筆寫本), 규정각 원문검색서비스 (奎章閣原文資料檢索):https://kyudb.snu.ac.kr/book/view.do?book_cd=GR32680_00,擷取日期:2021.4.17。此外,研究者可在奎章閣網站一併閱覽《啓本謄錄》的電子全文和全本原件圖像。感謝張澍博士後幫助釋讀韓文文獻。
37 《狀啓謄錄》(《啓本謄錄》),冊 1,頁 52a-52b。

1626)所據「老寨」與「遼陽」、「新城」並舉。³⁹天命六年(天啟元年,1621)三月,努爾哈赤攻取遼陽城以後,隨即遷都於此,同年八月在遼陽城外太子河以東興建宮室,修築東京城,俗名「新城」,到天命十年(天啟五年,1625)三月,努爾哈赤又選擇遷都瀋陽。⁴⁰由此可見,「老寨」或「老城」是相對新都遼陽而言的舊都,當指後金原先的都城赫圖阿拉。渾江是一條蜿蜒曲折的山區河流,其流向難以簡單概括,不過其下游總體上呈西北一東南走向,指示出一個從鴨綠江沿岸地帶至赫圖阿拉的進軍方向。天啟年間,毛文龍統領的東江鎮軍隊入據皮島後,不僅多次直接渡海登陸遼東半島,還從朝鮮境內出發越過鴨綠江,以襲擾後金,所涉地域遍及遼東邊墻內外。⁴¹由此可見,狀啟所言「由横江以逼奴酋老城」是毛文龍所部取道渾江方向對後金舊都腹地的襲擾行動。

《狀啓謄錄》揭示的史實並非孤例,還能得到其他諸多史料的支持。早在萬曆四十二年(1614),遼東巡撫張濤(1560-1618)構想進攻努爾哈赤的計劃時,就提出過「或用大兵從清、撫而入,直搗奴酋之巢;或走奇兵,從横江間道,星夜遄迫,以出奴酋之不意」的方案。⁴²在張濤看來,相比於出清河、撫順,從正面直取努爾哈赤的大本營(赫圖阿拉),取道橫江是迂迴出奇的作戰方案。取道渾江方向,從東南方逼近赫圖阿拉符合張濤「取道橫江」的用意。此後,萬曆四十七年(1619)初薩爾滸之役中南路明鮮聯軍的實際作戰行

³⁹ 費卹遼東御史方震孺言:「……奴向據老寨,聲息不通;今往遼陽,動靜無不悉聞,一可圖」;巡撫遼東右僉都御史張鳳翼言:「聲言水攻老寨,陸取新城,奴必狼顧狐疑,不敢出遼陽一步」;兵科左給事中陸文獻疏言:「奴酋之在老寨也,無日不討其部落而訓之;其在遼陽也,無日不討其軍實而警之」;兵部尚書高第覆議旅順駐防定畫疏曰:「夫文龍者以為征勦之大兵,而冒險以窺老寨,越遠以襲新城,則誣也」。見〔明〕溫體仁等奉敕撰,《明熹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卷12,天啟元年七月乙卯條,頁611-612;同書,卷38,天啟三年九月丁未條,頁1980、1982;同書,卷60,天啟五年六月壬午條,頁2797;同書,卷61,天啟五年七月甲子條,頁2879-2880。

⁴⁰ 白洪希,《清入關前都城研究》(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2007),頁 65-91。

⁴¹ 有關毛文龍天啟元年入據皮島以後,歷年對後金襲擾行動的概況,可參見陳涵韜, 《東江事略——毛文龍生平事跡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頁 29-41。

^{42 [}明]顧秉謙等奉敕撰,《明神宗實錄》,卷 517,萬曆四十二年二月己酉條,頁 9760。

動值得關注。詳究《光海君日記》的相關記錄可以發現,其中提到的橫江與 渾江十分相符。首先,明鮮聯軍大體是出寬奠,從南面逼近後金都城赫圖阿 拉,因此肯定要經過渾江流域。⁴³其次,《光海君日記》本身包含可資進一步 佐證的信息。除張其卓引述的史料外,前文腳註所引《光海君日記》的光海 君十年(萬曆四十六年,1618)六月辛未條摘錄了明朝遼東經略楊鎬(1555-1629) 的公文書,其中提到了「橫江上水口路徑」。而當年七月,明朝又傳令朝鮮王 朝,明確要求明年年初征剿時,朝鮮一軍「自波瀦江進兵」,儘管朝鮮軍隊最 終只是依附于南路明軍劉綎部,但從渾江方向進軍的計劃應該已然確定。⁴⁴

結合這兩則史料可知,早在薩爾滸之戰前數月,明朝已對經渾江方向而上的行軍路線做了先期偵察,確定要沿這一線進軍,還特別關注「横江上水口路經」。所謂「横江上」,指的應是渾江附近地區。渾江右側有諸多大小支流匯入幹流,所謂「水口」或與由此形成的諸多河口地帶有關,指橫江及其支流上的渡口。親歷南路進軍行動的明朝、朝鮮官員都提到了山地行軍的艱辛,例如監軍的海蓋道臣康應乾(1572-?)稱「重山之險,真如天塹」,45朝鮮隨軍幕僚李民寏(1573-1649)稱「道里阻絕,山高水深,行軍甚艱」。46由於地形的制約,明鮮聯軍選擇路線的餘地應該十分有限。那些山區河流的「水口」既可能是聯軍必須克服的障礙,也可能是迴避崎嶇地帶的必要路徑,故而必須先期偵察明白。姜弘立在啟本中提到的鴨兒河,應為清廷實測地圖中記錄的滿語水名「阿母八鴉兒滸(安巴雅爾呼必拉)」或「阿几个鴉兒滸(阿吉個雅兒滸必拉)」的省稱(見圖4、圖5),47也就是今天的大雅河或小雅河,均為渾江右側

⁴³ 涉及薩爾滸之役的歷史著作大多會注意這一點,例如稻葉君山,《清朝全史》,上卷,頁 163;陸戦史研究普及會編,《明と清の決戦:中國古戦史》(東京:原書房,1967),頁 103、付図第3、付図第4;三軍大學編著,《中國歷代戰爭史》(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9),册15,頁59、頁74、附圖15-602。

^{44 〔}朝〕春秋館撰,鼎足山本《光海君日記》,卷 130,光海君十年(萬曆四十六年)七月癸巳條,頁 17b;白新良,〈薩爾滸之戰與朝鮮出兵〉,《清史研究》,3 (1997),百 11。

⁴⁵ 姚宗文,〈敬陳遼左事宜疏〉,收入〔明〕程開祜輯,《籌遼碩畫》,卷43,頁618。 46 李民寏,《柵中日錄》(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頁449。

⁴⁷ 福克司版康熙《皇輿全覽圖》錄作「阿母八鴉兒滸」和「阿几个鴉兒滸」。Der Jesuiten-Atlas der Kanghsi-Zeit: China und die Aussenlaender, "Mukden":https://www.loc.gov/resource/g7820m.gct00265/,撷取日期:2022.12.1。《乾隆十三排圖》錄作「安巴雅爾呼必拉」和「阿吉個雅兒滸必拉」。"Qianlong 1766",QING

的支流。⁴⁸「大」和「小」分別意譯自滿語水名中的「安巴」和「阿濟格」。⁴⁹ 姜氏指出「鴨兒河凡四渡,深沒馬腹,水黑石大,人馬艱涉」,可見軍隊難以一次性越過鴨兒河,徑直北進,而是需要沿河谷地帶行軍,乃至屢次涉水。至於姜氏描繪的「大川縈紆」、「(橫江) 比鴨兒河深廣」的軍事地理圖景,正與大、小雅河匯入的蜿蜒曲折的渾江下游幹流河道相符合。⁵⁰明鮮聯軍的出發地和預想目的地都在渾江右側地區,但沿河谷地帶上溯時為取捷徑,可能會徑直穿過蜿蜒的渾江,正如他們渡過鴨兒河那樣,這就是「過涉橫江」的由來。可能由於朝鮮軍是配合明軍作戰的盟軍,因此其公文中直接使用了明朝方面慣用的橫江一詞。綜上可知,在薩爾滸之役中,渾江水系谷地至少部分充當

MAPS:https://qingmaps.org/maps/qianlong-1766,擷取日期:2022.12.1。按:女真語、滿語都以指代較大河流的 ula 對譯漢語的「江」,以指代較小河流的 bira 對譯漢語的「河」。見胡鴻,〈江到東北——古代東亞世界文化交流之一例〉,收入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編,羅豐主編,《絲綢之路上的考古、宗教與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頁 100-101。

⁴⁸ 大雅河主要流經今遼寧省桓仁滿族自治縣境內,小雅河主要流經今遼寧省寬甸滿族 自治縣境內。朱道清,《中國水系大辭典》(青島:青島出版社,1993),頁 47-48。 稻葉岩吉認為鴨兒河指大雅河及其支流。稻葉岩吉,《光海君時代の滿鮮關係》(首 爾:大阪屋號書店,1933),頁 173。張其卓起初認為鴨兒河指大雅河、小雅河,後 來認為鴨兒河就是指小雅河。王明恩主編,張其卓執行主編兼撰述,《丹東滿族史 略》,頁78;張其卓,《丹東建州女真史》(瀋陽:瀋陽出版社,2017),頁 249。

⁴⁹ 安巴雅勒呼河,「安巴」,國語解已見前注 (安巴,大也),「雅勒呼」,槽盆也。城西 南七百七十四里,源出薩穆禪山,東流,其北有棟鄂河,源出鈕勒們山,東南流入 焉;又東入佟家江。阿濟格雅勒呼河,國語解俱見前注 (阿濟格, 小也)。城西南八 百十里,源出薩穆禪山,東入佟家江。見〔清〕阿桂、劉謹之等奉敕撰,〔乾隆〕 《欽定盛京通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卷25、卷27,〈山川一・奉天 府各屬・興京〉、〈山川三・吉林各屬・吉林〉,頁 426、517。[嘉慶] 《欽定大清會 典》及《欽定大清會典圖》已將兩條河流的名稱著錄為「大雅爾滸河」與「小雅 爾滸河」, 而光緒《欽定大清會典圖》則進一步將之省稱為今名「大雅河」與「小 雅河」。參見〔清〕托津等奉敕纂、[嘉慶〕《欽定大清會典》, 卷 10、〈戸部・尚書 侍郎職掌一〉,頁436;[清]托津等奉敕纂,[嘉慶]《欽定大清會典圖》(臺北:文 海出版社,1992),卷90、〈輿地四・盛京・奉天府〉,頁3119、3129、3136;[清] 昆岡等修,〔清〕劉啟端等纂,〔光緒〕《欽定大清會典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2002),卷 147,〈 輿地九・盛京・鳳凰廳圖、與京廳圖 〉,頁 731、733。按: 筆者懷疑,本文圖 1、圖 2 中横江與鴨綠江之間的大月灣、小月灣或為大雅河、小 雅河在明代的另一種漢譯形式。儘管兩幅地圖方位扭曲嚴重,但其中橫江、大月 灣、小月灣、鴨綠江這組地名的排布卻大體符合渾江、大雅河、小雅河、鴨綠江之 間的方位關係。

⁵⁰ 朱道清,《中國水系辭典》,頁 54。

了南路明鮮聯軍的行軍通道。



圖 4 福克司版康熙《皇輿全覽圖》中的渾江與大、小雅河水系

資料來源:Der Jesuiten-Atlas der Kanghsi-Zeit: China und die Aussenlaender,
"Mukden",Library of Congress:https://www.loc.gov/resource/g7820m.gct00265/,撷取日期:2022.12.1。



圖 5 《乾隆十三排圖》中的渾江與大、小雅河水系

資料來源:"Qianlong 1766",QING MAPS: https://qingmaps.org/maps/qianlong-1766,頻取日期:2022.12.1。

戰役失敗之後,明朝官方仍舊十分重視橫江這個軍事通道。萬曆四十七年九月,蘇州府吳江縣舉人范世文(生卒不詳)上題本稱:「用舟師分載天津糧餉,佯以海運爲名,一從登州東至横江,以瞻寬奠;北至金州,以疏旅順三貝,……一從鴨綠淺由狼家塞,乘酋之不備,以搗其巢。」⁵¹可以看出,范世文對鴨綠江一橫江水系的軍事地理價值有一定了解。他認為明軍水師從登州出發經海路可以抵達橫江,從而窺視寬奠地區的動向。這說明橫江是寬奠地區附近的鴨綠江支流,符合渾江的地位。

天啟元年(1621)五月,遼東巡撫王化貞(?-1632)仍然寄希望於調集兵力 取道鴨綠江、橫江,從後方威脅赫圖阿拉,主張調七、八千浙江防海兵「從海 上來,由鴨綠鼓枻而東,直指黃〔橫〕江,繞出奴寨之後」,使努爾哈赤不敢 安居遼陽。52王化貞構想了一條從黃海入鴨綠江口,溯江而上,抵達橫江,迂

^{51 〔}明〕范世文,〈召對大臣以集忠謀疏〉,收入〔明〕程開祜輯,《籌遼碩畫》,卷30,頁42b-43a。

^{52 [}明]沈國元,《兩朝從信錄》(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6,頁109。

廻至後金舊都赫圖阿拉後方的進軍路線。前文所述毛文龍領導的東江集團立 足於海島,與後金長期對抗。他們也需要從大海深入到山區河谷地帶,方能 威脅後金腹地。據此可知,王化貞的作戰構想與天啟四年毛文龍麾下某部的 實際進軍路線高度相符。王氏提到的橫江顯然指與鴨綠江幹流相連的渾江。

除天啟四年的戰例之外,早在上一年,毛文龍所部已在對後金的襲擾中抵達過橫江。天啟三年八月初六日的東江鎮塘報記錄了當年七月毛文龍率部兵分六路襲擾後金的經過,其中摘錄了哨探千總金世用(生卒不詳)的報告:「小的遵守軍令,到滿浦地方,會高麗計節制使,差麗人三名,隨領劉登等三隊人馬過江。至七月二十日,到橫江地面。」53明末時事小說《遼海丹忠錄》也記錄了此次戰事的諸多細節。54書中描述了參將易承惠(生卒不詳)所部與塘報中金世用所部行程類似的襲擾行動,稱易氏「督兵一千,前往滿浦,渡烏龍江,取路直入,……到横江地方,札下一個寨,放炮吶喊,縱兵攻打各堡」。55所謂烏龍江顯然是鴨綠江之誤。東江鎮軍隊從滿浦渡過鴨綠江深入後金腹地,勢必會到達渾江附近。

到天啟六年(1626),登萊巡撫李嵩(1578-?)上言提到,毛文龍據逃回漢人 張有庫(生卒不詳)提供的消息來揭稱,努爾哈赤正調集木匠「在横江、溷河等 處造船打車」。⁵⁶結合前文對烏龍江的分析可以想見,明朝官員還是擔心後金 經鴨綠江水系入海威脅登萊。崇禎元年(1628),遼東參謀都司胡以寧(生卒不 詳)上言稱:「若蓋套,若長生島,若鎮江、鳳凰山,若鴨綠、横江等處,皆 可出奇為疑伏,為犄角。」⁵⁷根據《崇禎長編》記載,崇禎元年時胡以寧是「遼

^{53 [}明]毛承斗輯,賈乃謙點校,《東江疏揭塘報節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6),卷2,〈天啟三年八月初六日塘報〉,頁18。

⁵⁴ 有學者詳細對比了《東江疏揭塘報節抄》和《遼海丹忠錄》的內容,發現二書有諸多細節相同,後書必定直接或間接參考過前書。顧克勇,〈《遼海丹忠錄》的材料來源及創作特色〉,收入廖可斌主編,《2006明代文學論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頁561-565。

^{55 〔}明〕陸人龍,《遼海丹忠錄》(北京:中華書局,1990),第19回,〈張盤恢復金州 杜貴大戰滿浦〉,頁1920-1921。

^{56 [}明]溫體仁等奉敕撰,《明熹宗實錄》,卷70,天啟六年四月辛丑條,頁3408。

^{57 [}明]談遷著,張宗祥校點,《國權》(北京:古籍出版社,1958),卷89,崇禎元 年四月乙巳條,頁5430。

東巡撫標下叅謀都司僉書」,應該任職於遼西走廊的關寧前線。⁵⁸但他同樣重視鴨綠江—橫江孔道的軍事價值。

此外,晚明廣東博羅人張萱(1558-1641)致力於編纂本朝史,辭官歸鄉後, 最終撰成了《西園聞見錄》一書。⁵⁹該書多有涉及明末遼事,例如下面這段文 字:

余按自膠萊導成山, 派石河驛抵遼陽, 旬日之程耳。又自石河轉金州, 入朝鮮市場, 沿横江而北, 直達干古里、木牛等住牧之地, 風汛不愆, 計程半月, 足食足兵, 無便于此。 60

引文的寫作年代不詳,但張萱在其所在之卷還收錄了他作於萬曆四十七年的《己未西園聞遼警詩小序》,稱「撫順、開原、鐵嶺相次告潰」。⁶¹故可推測,引文或成於這之後。其中提到的「朝鮮市場」指明朝和朝鮮鴨綠江交界地帶的中江開市,存在於萬曆二十一(宣祖二十六年,1593)至四十一年(光海君五年,1613)間。⁶²這裡應該代指鴨綠江河口地帶。關於「干古里、木牛」,張萱在《西園聞見錄》中另有記述:「又距建州西十餘里,為建夷部落虎失住牧之地……又西十餘里,建酋所設中軍張海,頭目干古里、木牛等住牧于此。」⁶³萬曆三十七年,遼東巡按熊廷弼在所上題本中稱努爾哈赤「差部夷干骨里、牧牛二夷」前來交涉。⁶⁴這些證據說明「干古里、木牛等住牧之地」應指努爾哈赤統治的核心地帶。張萱沒有明確區分鴨綠江和橫江,但顯然對鴨綠江水系的走

^{58 [}清]汪楫等輯,《崇禎長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卷8, 崇禎元年四月己亥條,頁409。

^{59 [}明]張萱,〈西園聞見錄緣起〉,收入張萱,《西園聞見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2002),頁3。

^{60 [}明]張萱,《西園聞見錄》,卷 53,〈邊防前下·遼東鎮〉,頁 341。影印本原文 「干」誤作「于」。

^{61 [}明]張萱,《西園聞見錄》,卷53,〈邊防前下·遼東鎮〉,頁340-341。

⁶² 高艷林,〈明代萬曆時期中朝「中江關市」設罷之始末〉,《中國歷史文物》,2 (2006),頁38-43;沈載權,〈『咨文』을 통한朝鮮과 明의 中江開市 開設과 革罷 과정 분석〉,《古文書研究》,45(2014),頁159-183。程開枯輯《籌遼碩畫》的〈遼 東圖〉在靠近鴨綠江口的江心嶼上標註有「朝鮮市場」(見圖1)。張鼐《遼夷略》則 在遼東地圖的同樣位置標註有「鴨綠江中洲,每月朔,遼人、麗人于此交易」(見圖3)。

^{63 [}明]張萱,《西園聞見錄》,卷 53,〈邊防前下·遼東鎮〉,頁 339。影印本原文 「干古里、木牛等」誤作「千古里、木牛籌」。

^{64 [}明]熊廷弼,《按遼疏稿》,卷2,〈酌東西情勢疏〉,頁428。

向有所了解。他描述了一條從山東半島跨海,經遼東半島南部的金州衛,一路北上進入鴨綠江口,再經渾江到達建州女真腹地的交通路線。張萱認為只要天氣狀況良好,僅需半月就可走完這條路線,「足食足兵,無便於此」,恐非泛論進兵轉餉之道,而是針對進攻努爾哈赤的方案而言。

總之,《狀啓謄錄》的記錄直白地證實了橫江即渾江。這一證據源自明朝將領與朝鮮邊地官員交流情報的需要,具有特殊性,但卻披露了明末渾江重要的軍事地理地位。細緻梳理明朝、朝鮮王朝各類零碎的文獻記錄可以發現,明末的鴨綠江一橫江水系是一條溝通大海與內陸山區後金腹地的重要軍事通道。橫江不僅是從東南面深入後金腹地的地理坐標,其水道本身也被明末時人認為具有潛在的通航運兵價值。65明朝文武官員、士人為對抗後金,不只一次構想或實踐經橫江流域進攻後金腹地,同時也擔心後金軍隊經橫江、鴨綠江出海,南下威脅登萊一帶。由此可見,前述各類有關明末遼東橫江的記錄並不是雜亂無章的,而是可以被理解的,能夠補充證實「橫江即渾江」說。

三、晚明遼東橫江他義、別稱、引申義辨析

經過上述考證,本文構建了對各類文獻中晚明遼東橫江含義的解釋通例。不過,完整的史料面貌要更為複雜,涉及晚明遼東橫江的他義、別稱和 引申義,還需仔細辯明。

其一,個別明代文獻中提到的遼東橫江似乎不是很契合上一節的考證結 論。熊廷弼題本與姜弘立馳啟的記述清楚地說明,橫江和鴨綠江是兩個不同

⁶⁵ 明代女真人時有用船渡河劫掠朝鮮邊境。一些文獻記錄明確提到他們在婆豬江,即 渾江上行船。參見姜大鵬,〈明代女真者皮船考〉,收入遼寧省博物館、遼寧省遼金 契丹女真史研究會編,《遼金歷史與考古》(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18),輯8, 頁190-198。另外,1912-1937年間,渾江下游穩定存在過從桓仁直通安東(今遼寧 省丹東市)的水運貿易業。張永增口述,張吉滿筆錄,〈我所知道的渾江水運〉,收 入通化市政協文史學習委員會編,《東邊道經濟開發史略》(通化:通化市政協文史 學習委員會,1998),頁351-355。

的地理單元。⁶⁶然而,筆者注意到有二條記載中的遼東橫江似指鴨綠江,其中一條也見於天啟三年八月初六日東江鎮毛文龍的塘報。根據塘報記載,游擊馬應魁(生卒不詳)、都司林茂春(生卒不詳)率部從朝鮮邊境重鎮滿浦渡過鴨綠江,放炮燒山,更換旗號服色,大造聲勢,之後便撤回鴨綠江左岸,等到趕到滿浦對岸前來剿殺的後金大軍離開後,「於十七日二更時分,復渡橫江,黎明直奔互市處」,圍攻留守互市處的三百後金軍隊。⁶⁷滿浦是位於鴨綠江左岸的朝鮮邊境重鎮,且遠在渾江口的上游,是建州女真與朝鮮王朝重要的互市地點。⁶⁸塘報提到的互市處應該就位於滿浦對岸。所謂「復渡橫江」指再次渡過鴨綠江。另一條見於黃道周(1585-1646)的《博物典匯》,不過含義相對模糊,可靠性不強。該書有載:「其(指努爾哈赤) 地界南隣朝鮮義州,橫江為界。」⁶⁹若「横江為界」指以橫江為界,則橫江指鴨綠江。⁷⁰但橫字若作動詞解,則記載含義似為一條江橫亙在努爾哈赤政權與朝鮮之間充當邊界,所謂橫江不是專有名詞。

明代文獻中疑似稱鴨綠江為橫江的情況,可能恰恰反映了晚明時人對橫江和鴨綠江關係的了解。渾江全長 445 公里,而鴨綠江在今吉林省境內(即渾江口以上)的干流長度也不過 575 公里。⁷¹更何況,明朝人應該不了解兩條河流的確切源頭,很可能覺得兩者長度不相上下。古人本就有以兩條交匯的長短相若的河流「互受通稱」,乃至可能「互受別稱」的情況。⁷²明人如將橫江視

⁶⁶ 姜弘立所率朝鮮軍隊,於光海君十一年(萬曆四十七年)二月十九日到二十三日, 陸續從昌城渡過鴨綠江。參見〔朝〕李民寏,《柵中日錄》,頁 447-448;〔朝〕李民 寏,《紫巖先生文集》(新北:漢棠文書股份有限公司,2017),卷7,〈年譜〉,頁 315;〔朝〕春秋館撰,鼎足山本《光海君日記》,卷137,光海君十一年(萬曆四十 七年)二月乙亥條,頁10a。可見,二月辛巳(二十七日)「又將過涉橫江」,所謂 「橫江」顯然不是指鴨綠江。

^{67 [}明]毛承斗輯,賈乃謙點校,《東江疏揭塘報節抄》,卷2,〈天啟三年八月初六日塘報〉,頁16-17。

⁶⁸ 河內良弘著,趙令志、史可非譯,《明代女真史研究》(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 2015),頁590-598、609。

^{69 [}明] 黄道周,《博物典匯》(海口:海口出版社,2000),卷20,〈四夷·奴酋〉,頁 336。

⁷⁰ 張其卓認為此橫江指「鴨綠江大江口」。參見張其卓,《丹東建州女真史》,頁 223。

⁷¹ 朱道清,《中國水系大辭典》,頁 46、47。

^{72 [}清]楊守敬,《晦明軒稿》(臺北:文海出版社,1979),〈《漢志》絳水考〉、〈《禹貢》「涇屬渭汭」説〉,頁31;辛德勇,〈由清華大學藏戰國竹書《越公其事》談及

為鴨綠江正源,就可能將渾江口以下部分的鴨綠江河段也稱為橫江。

其二,明代文獻有時將橫江記作橫河。明末方孔炤(1591-1655)所撰《全邊略記》記載,天啟三年八月,毛文龍部兵分六路,分別從「清河、小孤(山)、靉陽、洒馬(吉)、横江、析木(城)」方向出擊後金。⁷³而記錄此役戰況的天啟三年九月初一日東江鎮塘報詳細羅列了六路進軍的具體情況,其中提及的進軍方向均可與《全邊略記》一一對應,惟獨對橫江一路的描述較為特殊:「又令遊擊曲承恩、中軍馮翼武等領兵三千,從橫河過渡,踰董骨寨,繞出其後。」⁷⁴這表明橫江又可稱橫河。塘報記錄的地理信息也可補證此論斷。董骨寨是建州女真棟鄂部的城寨,大概位於渾江干流右側的大雅河流域。⁷⁵這說明曲承恩(生卒不詳)率部從渾江左岸向西跨河進攻,越過了董骨寨。其進軍方向與天啟三年七月的金世用部類似。曲承恩所部的出發地可能也是滿浦。

萬曆四十七年遼東巡撫周永春、遼東經略熊廷弼上奏之題本也證明橫江 別稱橫河。程開祜輯《籌遼碩畫》收錄的題本寫道:「鎭江之兵,協同朝鮮之 兵把守硯水嶺並橫江一帶,使虜不得入而長驅鎮江鹽場。」⁷⁶而熊廷弼《經略 熊先生全集》所收題本將「横江」寫做「横河」。⁷⁷從題本的行文可以看出, 周永春、熊廷弼主張讓駐紮在邊境鎮江堡的明軍聯合朝鮮軍加強守備,以防

春秋末期吴國的都城與《禹貢》三江問題〉,收入彭林主編,《中國經學》(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輯27,頁139-140。

^{73 [}明]方孔炤,《全邊略記》(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9、〈海略〉,頁334。

⁷⁴ 〔明〕毛承斗輯,賈乃謙點校,《東江疏揭塘報節抄》,卷 2,〈天啟三年九月初一日塘報〉,頁 22。

⁷⁵ 明代文獻中的所謂董骨寨(董古寨)或指建州女真董鄂部的棟鄂城。董鄂部之名很可能與渾江右側支流大雅河的支流冬古河(棟鄂河)有關,因此研究者一般認為棟鄂城位於大雅河流域。遼寧省桓仁滿族自治縣的地方文史工作者還結合文獻記載和地理條件,推測棟鄂城位於今桓仁滿族自治縣八里甸子鎮韭菜園子村。參見稻葉岩吉,〈建州女直の原地及び遷住地〉,收入白鳥庫吉監修,松井等、箭內亙、稻葉岩吉撰,《滿洲歷史地理》,卷2,頁572;稻葉岩吉,〈清初の疆域〉,收入白鳥庫吉監修,松井等、箭內亙、稻葉岩吉撰,《滿洲歷史地理》,卷2,頁611-612;王從安、關惠喜、王俊輝、張士海、〈棟鄂城遺址研究〉,收入孫誠、張德玉主編,《建州女真暨董鄂部研究》(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6),頁178-184。

⁷⁶ 〔明〕周永春、〈添兵防守朝鮮疏〉、收入〔明〕程開祜輯、《籌遼碩畫》、卷 32、頁 13a。

^{77 [}明]熊廷弼,《經略熊先生全集》(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末廣陵汪修能重刊本),疏稿卷2,〈朝鮮貢道添兵疏〉,頁11a。

後金軍隊南下海濱襲擊鎮江堡一帶的鹽場。顯然地,這樣的部署旨在封鎖入海的鴨綠江通道。硯水嶺和橫江應該也是後金軍隊南下的必經之地,因此明鮮聯軍也需要在此布防。「硯水嶺」應指《光海君日記》和李民寏《柵中日錄》中提到的「渰水嶺」。兩書均記載,萬曆四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姜弘立率領的朝鮮軍隊「踰渰水嶺」,到達亮馬佃。78此時,距離朝鮮軍完全渡過鴨綠江才過去二日。到二十七日,朝鮮軍「渡鴨兒河」,且「又將過涉橫江」。79這說明渰水嶺位於鴨綠江右岸地區,距鴨綠江幹流和渾江諸水系的行程均不太遠。80至此可以推斷,周永春、熊廷弼力圖加強守備的「硯水嶺並橫江一帶」正是薩爾滸之役中南路明鮮聯軍北進的必經之地,大致屬於渾江谷地及其附近地區。

上述兩則案例表明,晚明文獻中的確存在將橫江稱為橫河的情況。此外,天啟三年八月,徽州歙縣人汪汝淳(1563-1635?)撰成《毛大將軍海上情形》一書,宣揚了毛文龍抗擊後金的事績。⁸¹書中寫道:「今軍聲大振,寬、鎮、鳳、靉、蒲、横諸城堡,俱已遣將收復,設立防守」,「又自去歲至今,招囬奴酋剃編遼兵五六萬外,正、三、四月陸續遣將領兵,進復鎮江、寬奠、靉陽、鳳皇城、橫河、蒲江」,「其進復據守之城堡,及委守兵將……横河則委游擊

⁷⁸ 〔朝〕春秋館撰,鼎足山本《光海君日記》,卷 137,光海君十一年(萬曆四十七年) 二月己未條,頁 11a;〔朝〕李民寏,《柵中日錄》,頁 448。

^{79 〔}朝〕春秋館撰,鼎足山本《光海君日記》,卷 137,光海君十一年(萬曆四十七年)二月辛巳條,頁 11b-12a。

⁸⁰ 張其卓認為「渰」通「淹」,意為雨水歸一,水勢浩大。因此,渰水嶺指位於寬奠縣城東北30餘公里,太平哨村西南,南股河與北股河交匯處的陰魂陣嶺(陽和嶺),亮馬佃就位於太平哨。南股河與北股河交匯成半拉江後,向東北方注入渾江。參見王明恩主編,張其卓執行主編兼撰述,《丹東滿族史略》,頁80;張其卓,《丹東建州女真史》,頁243-244。按:雖然遼寧當地文史工作者多認為亮馬佃即今之太平哨。除張其卓論著外,另見王從安,〈桓仁縣境最大的古戰場——細說薩爾滸大戰的東線之戰〉,《滿族研究》,3(2001),頁52;曹文奇,〈薩爾滸之戰東路軍古戰場考察〉,收入曹文奇主編,《新賓清前史研究論叢》(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3),頁77。但早期日本學界的研究認為亮馬佃位於寬甸頭道溝(今寬甸滿族自治縣大川頭鎮頭道溝村)。見陸戦史研究普及會編,《明と清の決戦:中國古戦史》,付図第4。

^{81 [}明]汪汝淳,《毛大將軍海上情形》(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江戶初年寫本)。有關作者汪汝淳的概況,參閱鄭誠,〈西學出版與東江貿易——明末徽商汪汝淳事跡補考〉,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編,《明史研究論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輯19,頁180-193。

卜天成領兵一千五百人防守。」⁸²在毛文龍進據的幾個地方中,寬奠、鎮江、 靉陽、鳳凰城都是明朝遼東東南部的重要邊防據點。據此可以推斷,橫河、 蒲江也位於這一帶。⁸³所謂橫河指的應該就是橫江。

此後,有人接替了卜天成(生卒不詳)的橫河(橫江)游擊職位,繼續在當地加強防備。天啟四年二月十六日,毛文龍在塘報中闡述了去年七、九月以來的軍隊部署方略,其中有這樣的記述:「如都司李繼盛、盛文舉據守滿浦等處,乃貼近老寨之要津,建夷馬市之沖邊。復令橫江遊擊馬應魁等遊騎搗掣,日勤接渡,遙應李、盛二將之兵。」⁸⁴引文提到馬應魁擔任橫江游擊。毛文龍命令他以遊騎襲擾後金,日常接應渡河的軍隊,與滿浦的李繼盛、盛文舉所部遙相呼應。所謂「日勤接渡」涉及的河流不詳,可能指鴨綠江,也可能指橫江(渾江)。筆者推測,天啟三年橫河(橫江)游擊卜天成、馬應魁所部主要活動於鴨綠江與渾江之間的地帶。他們作為前哨部隊襲擾後金,接應從滿浦渡過鴨綠江,深入渾江流域,進攻後金腹地的其他部隊。

汪汝淳似乎將橫河、蒲江也視作城堡,其實不然。該書在談及「寬、鎮、鳳、靉、蒲、横諸城堡」具體的兵力部署時,分別以寬奠堡、鎮江堡、鳳凰城、叆陽堡稱呼前四個地點,而對後兩個地點僅以蒲江、橫河稱之。⁸⁵所謂「諸城堡」只是隨意的並稱而已。無論城堡還是河流,都是東江鎮軍隊標定進軍方向或防備區域的地理坐標。《狀啓謄錄》中明朝參將徐孤臣的言論已經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

最後需要注意的是,晚明文獻中遼東橫河的地望還另有他指。明末熊廷弼等官員在書信、奏疏中討論遼東戰事時,多次提到撫順、瀋陽附近的橫河。⁸⁶

^{82 [}明]汪汝淳,《毛大將軍海上情形》,無頁碼。

⁸³ 蒲江的地理位置不明,各類明代基本史籍均無記載,似乎不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大型邊防據點。明代遼東瀋陽城以北有蒲河與蒲河所,但它們顯然不符合《毛大將軍海上情形》描述的軍事地理態勢。筆者懷疑「蒲江」更為規範的名稱是「蒲河」,也就是今寬甸滿族自治縣境內的大蒲石河或小蒲石河。

^{84 [}明]毛承斗輯,賈乃謙點校,《東江疏揭塘報節抄》,卷3,〈天啟四年二月十六日塘報〉,頁35。

^{85 [}明]汪汝淳,《毛大將軍海上情形》,無頁碼。

⁸⁶ 熊廷弼在信中多次提及遼東戰事:「假使該將移駐平虜堡,偏在西北空處,而賊從長營、長勇之間,緣橫河而趋東南,則何以應之」;「瀋陽、奉集並處扼要,若前日只守瀋陽,不守奉集,或往守稍遲,而十二日之役,賊與賀鎮相持于橫河之北,而

這條橫河其實就是發源於撫順關外,流經遼東鎮核心地帶的渾河。⁸⁷渾河與渾江屬於完全不同的兩個水系,研究者在接觸相關史料時必須仔細甄別,以免 誤判。

其三,横江從河流名稱引申成為了區域名稱。本文第二節已經提到,張鼐《遼夷略》中的横江引申出了新的地名含義。這並非張鼐的首創,除「横江一帶」外,熊廷弼在書信中就已經有「横江新地二百餘里」、「横江地方」等表述。⁸⁸這些表述明顯都是與「横江百里」類似的省稱,將河流名變成了區域名。事實上,自熊廷弼勘界以後,頗有明朝官僚士人在談到寬奠新疆棄地問題時有這類表述。萬曆四十六年,徐光啟(1562-1633)在書信中稱「無棄横江之地,使六萬之衆,人自為守」。⁸⁹茅元儀(1594-1640)稱「然横江之二百里,鴉鶻關之七十餘里,皆不吐」。⁹⁰張溥(1602-1641)稱「横江之二百里,鴉鶻關

率其半南搶深入,且不知于何底止」;「遂提兵逆于横河之北,對河射打,賊不敢過河攻瀋」。見〔明〕熊廷弼,《遼中書牘》(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1,〈荅王霽宇制府(邊務五則)〉,頁655;[明〕熊廷弼,《經略熊先生全集》,書牘卷4,〈與柴總兵(國柱)(庚申六月十七日)〉,頁52a;同書,〈答文受寰制府(庚申六月二十三日)〉,頁58a。薛三才奏疏中載:「據坐營遊擊梁汝貴差夜不收口報,二十一日四更時分,本官會同各將領帶領兵馬,分爲五路,追赶至撫順城南横河。」見〔明〕薛三才,〈奴酋計殺官兵疏〉,收入〔明〕程開祜輯,《籌遼碩畫》,卷3,頁20a-20b;王在晉記載:「陳策、童仲揆移兵皇山,以遏瀋、奉之衝,分營扎横河南。」見〔明〕王在晉,《三朝遼事實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3,〈庚申六月起是年九月為泰昌元年至天啟元年辛酉二月止〉,頁111。徐爾一則是在奏疏中寫到:「廷弼經理不及一年,而俄而進築奉集、瀋陽,俄而進屯虎皮驛,又俄而迎拒於横河之上。」見〔明〕徐爾一,〈辨功罪疏〉,收入〔明〕熊廷弼,《熊襄愍公集》,卷末,頁381。

⁸⁷ 萬曆四十八年七月熊廷弼上奏的〈賊夷分頭入犯疏〉描述了前引熊廷弼書信中提到的六月十二日之役,其中稱橫河為渾河。參見〔明〕熊廷弼,《經略熊先生全集》,疏稿卷4、〈賊夷分頭入犯疏〉,頁13a、14b。王在晉《三朝遼事實錄》中提到的橫河在清代文獻中被記作渾河。見葉覺邁修,陳伯陶纂,民國《東莞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卷62、〈人物略九·明八·陳策〉,頁2427。

^{88 [}明]熊廷弼,《遼中書牘》,卷1,〈荅王霽宇制府〉,頁 639、640。

^{89 [}明]徐光啟,《徐氏庖言》(巴黎: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明刻本),卷4,〈復 呂益軒中丞(戊午)〉,頁5b。

^{90 [}明]茅元儀,《武備志》(北京:解放軍出版社、瀋陽:遼瀋書社,1989),卷 228,〈女直考〉,頁10005。

之七十餘里,盡為其有」。⁹¹這些表述主要本自熊廷弼的勘界調查結果。⁹²由 此可見,橫江成為了位於寬奠五堡以東,渾江以西的鴨綠江沿岸新拓地的代 名詞,是地名行用過程中自然形成的簡便稱謂。

作為區域名稱的橫江不只是源自官僚士人省稱,僅具地理坐標意義的空 殼。晚明時人注意到,橫江地區在萬曆三十年代的棄地事件後並未沉寂,仍 然保有著活躍的地方社會。崇禎初年,陳仁錫(1579-1634)「奉命宣詔三韓,凡 亭障徼塞險阨之處,皆詳志之,作《籌邊圖說》」。93可見他去過遼東前線,且 有意識地搜集了大量有關遼東邊防事務的資料,這在其文集的《山海紀聞》部分表現得很清楚。94他在《山海紀聞》中摘錄了一段〈紀橫江〉,專門描述了橫江這個區域:

横江者,東界鴨綠,西接内地,北鄰奴酋,南抵鎮江,為舊滅夷王杲之地,中國所開展未盡之疆,其實非奴地也,方圓可四百里,土極膏腹〔腴〕。寬、鎮、遼、瀋、金、復等處豪横之民,以及西南罪配、貿易之徒,盤據其間,以圖礦參掘採之利,可使也。95

根據這段引文的描述可知,橫江地區大體上夾在西面的「內地」和東北一西

^{91 〔}明〕張溥,《七錄齋集六卷論略一卷》(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女直論〉,頁 357。

⁹² 熊廷弼奏疏中寫到:「至近年,撫臣趙楫、鎮臣李成梁慮開邊釁,銳然議行招撫。廢將韓宗功爲成梁壻,納建酋重賄,斃作逃民給帖,驅逐六萬四千餘衆。撫、鎮等臣,各論功陞賞加。……至於清河之鴉鶻闆、松樹口、東安、靖安、靖房、靖房空、向化、靖夷、一堵墙之盤嶺各墩,一連九座,長六十六里。此皆誌書所載我之舊邊也,今則縮守內地四十里,而七十里之邊失矣。」見〔明〕熊廷弼,《按遼疏稿》,卷2,〈勘覆地界疏〉,頁397-398、402;又,在信中提及:「奴之所欲在土地者,横江新地二百餘里不以歸,鴉鶻關地七十餘里不以歸。」見〔明〕熊廷弼,《遼中書牘》,卷1,〈荅王霽宇制府〉,頁639。

^{93 〔}清〕張岱,《石匱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203,〈陳仁錫列傳〉, 頁160。

⁹⁴ 不過,當時明朝遼河以東的土地為後金所據已有八年之久。陳仁錫不可能親身前往那裡一探究竟。他記錄的許多信息顯然來自過去的資料。例如前文提到的周永春、熊廷弼的題本,就被陳仁錫節錄進《山海紀聞》中,命名為〈紀寬靉鎮江〉。參見〔明〕陳仁錫,《陳太史無夢園初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海集二,〈錦寧道中〉,「紀寬靉鎮江」,頁 286-287。研究者切不可把陳仁錫記錄的遼東邊務資料一概視作崇禎初年的時新信息。

^{95 [}明]陳仁錫,《陳太史無夢園初集》,海集二,〈錦寧道中〉,「紀寬靉鎮江」,頁 297。

南流向的鴨綠江之間,北部與建州女真努爾哈赤控制的地區接壤,而沿鴨綠江順流而下,能夠抵達靠近河口地帶的鎮江堡。其中提到的「王杲」恐為「王兀堂」之誤。⁹⁶該區域活躍著的「豪横之民」來自遼東各地,其中也包括寬奠、鎮江。這意味著此二地也不在横江範圍內,應屬横江「西接」之「內地」。可見,橫江地區的範圍與寬奠新疆頗為契合,不包括寬奠六堡。此外,引文對橫江地區的特點也有簡要的概括。這個區域土地肥沃,物產豐富,不論努爾哈赤還是明朝都對其缺乏有效的掌控。各色人等進入其中,從事採掘礦產、人參等山地資源的經濟活動。可以說,橫江地區是一個地處明朝、建州女真努爾哈赤、朝鮮王朝之間的微妙的夾縫地帶。

根據以上線索可以推知,〈紀橫江〉不只是對萬曆三十年代棄地事件之前 寬奠新疆邊民社會的追述,所謂「可使也」暴露了該文本實際生成的年代。 萬曆四十六年後金向明朝開戰以後,明朝為應對遼東戰事,開始在全國各地 招募兵馬,這其中就包括遼東本地的橫江礦徒。萬曆四十六年閏四月,兵部 上奏題本呈報征剿後金的計劃,稱「至于横江一帶礦徒,先經移書督撫,設 法招集,近得督臣汪可受手書,謂已招有數千」。97同月,江西道御史薛貞(1570-1631)上奏題本稱:「借北關爲嚮導,令朝鮮爲羽翼,用横江亡命之民,示復其 故土而使之,以仇攻仇,三面夾攻,肩背受敵。」98當年五月,河東巡鹽御史 王遠宜(1570-?)上奏題本稱:「邊兵選用不足,而調及各省及横江亾命礦徒, 以壓卵覆巢。」99根據這些記載可知,明朝力圖招募橫江礦徒,以充實進攻後

⁹⁶ 嘉萬之際,建州女真首領王杲(1529-1575)雄踞於撫順關外的古勒寨一帶。建州女真首領王兀堂(生卒不詳)主要活動於今遼寧省桓仁滿族自治縣一帶,萬曆初年曾與明朝在寬奠六堡地區互市,後又與明朝發生軍事衝突,最終敗退不知所終。有關王杲、王兀堂的生平概況,參見河內良弘,《明代女真史研究》,頁687-698。

^{97 [}明]薛三才,〈按征播倭事例酌議兵食疏〉,收入[明]程開祜輯,《籌遼碩畫》, 卷 4,頁 43b。

^{98 [}明]薛貞、〈申飭固守大張撻伐疏〉,收入[明]程開祜輯、《籌遼碩畫》,卷4,頁 54h。

^{99 〔}明〕王遠宜,〈聽言圖剿以奮國威疏〉,收入〔明〕程開祜輯,《籌遼碩畫》,卷 6,頁23a。按:萬曆四十六年時,王遠宜正任「廵按山西等處監察御史」,巡鹽 河東,《籌遼碩畫》誤記為「山東廵按」。〔明〕顧秉謙等奉敕撰,《明神宗實錄》, 卷568,萬曆四十六年四月庚寅朔條;卷577,萬曆四十六年十二月壬戌條,頁 10679、10921;〔清〕馮達道纂修,《新修河東運司志》(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 1996),卷3,〈監臨〉,頁554;〔明〕王遠宜,〈重修育才館碑記〉,見劉澤民總主

金的兵力。本文認為,這裡的橫江就是指陳仁錫記錄的橫江地區。也就是說, 横江地區的邊民活動在明朝棄守寬奠新疆後繼續維持了十數年,甚至保有自 成一體的地方軍事力量。

編,李玉民執行總主編,張培蓮本卷主編,《三晉石刻大全・鹽湖區卷》(太原:三 晉出版社,2010),頁190-1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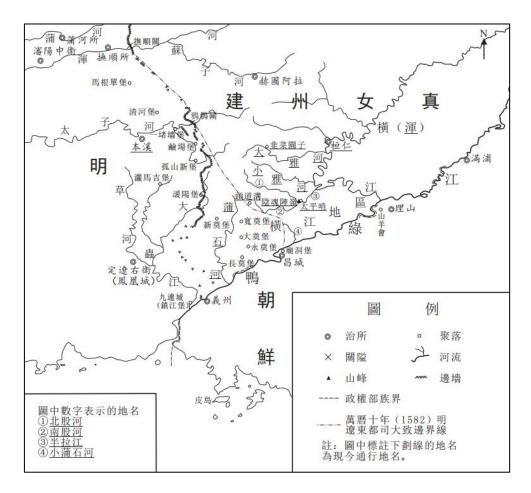


圖 6 晚明遼東東邊簡明示意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100

¹⁰⁰本圖主要以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七冊「元·明時期」中的「山東二(遼東都司)」圖和第八冊「清時期」中的「盛京(奉天)」圖為基礎擴繪而成。不過,本圖中的邊墻關隘則參考王曉明(微博 ID:軍事歷史地圖)《明代遼東軍事地理圖》(2018年5月編)改繪而成。有關這幅地圖的基本概況及參考文獻,可見「軍事歷史地圖」微博主頁:https://weibo.com/2787626063/Geuccjmw9#comment,擷取日期:2022.12.12;並淘寶店鋪漢宸文化,【裝飾畫訂制 全國包郵】明代遼東軍事地理: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6.798e352emHnoe6&id=568919062551&ns=1&abbucket=16#detail,擷取日期:2022.12.12。《明代遼東軍事地理圖》參考了以《遼寧省明長城資源調查報告》為代表的新近長城古跡調查資料,故而更訂了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中的一些粗疏錯誤之處。相應的,本圖的遼東都司邊界線相對於譚圖整體有所回縮。部分該圖未繪的小段邊墻,本圖參照《遼寧省明

四、橫江在文獻記錄中出現和消失的歷史背景

横江與學界熟知的漢文水名婆豬江在明代的使用時段有明顯的區隔。十五世紀前中期,明王朝曾較為積極地經略女真地區,對渾江流域有過粗略的了解。即便如此,現存的相關記載也不是很多,且大都伴隨著朝鮮王朝的身影。根據《朝鮮王朝實錄》的記載,永樂末年,明成祖朱棣(1360-1424)曾諭令建州衛部眾移居婆豬江流域,並稱會將此事告知朝鮮國王。¹⁰¹這表明永樂朝廷對婆豬江的地理位置已有所了解,知道婆豬江靠近朝鮮。《明實錄》涉及婆豬江的幾處記載大都集中在《英宗實錄》中,也都與建州女真在當地定居,乃至和朝鮮王朝發生衝突有關,其中還包括朝鮮方面的奏文。¹⁰²成化三年(世祖十三年,1467)和成化十五年(成宗十年,1479),明朝兩次聯合朝鮮攻入婆猪江流域,征伐建州女真。¹⁰³明軍統帥趙輔(?-1486)在誇耀成化三年之役功業的〈平夷賦〉中提到,明朝的右路軍隊進軍至「潑猪江」。¹⁰⁴明朝將領韓斌(1429-

長城資源調查報告》一併繪入,見遼寧省文物局編著,《遼寧省明長城資源調查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頁 27-27、47、545。此外,本圖部分明遼東都司以外的地名定位,參考了 20 世紀 30 年代日本陸軍參謀本部陸地測量部繪製《滿洲十萬分一圖》中的「草帽頂山」、「寬甸」、「懷仁」、「太平哨」、「昌城」、「楚山」、「滿浦鎮」諸圖。參陸地測量部,《満洲十万分一図》(日本:大日本帝国陸地測量部,昭和 8-14 年 [1933-1939]),Trove:https://nla.gov.au/nla.obj-234630899/view、https://nla.gov.au/nla.obj-234631003/view、https://nla.gov.au/nla.obj-234634803/view、https://nla.gov.au/nla.obj-23463481/view、https://nla.gov.au/nla.obj-234634148/view,拥取日期:2023.2.22。

^{101 [}朝]春秋館撰,《朝鮮世宗大王實錄》(首爾: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1930),卷24,世宗六年(永樂二十二年)四月辛未條,頁9a;[朝]春秋館撰,《朝鮮世祖大王實錄》(首爾: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1930),卷29,世祖八年(天順六年)十二月丁亥條,頁33b。

^{102 [}明]陳文等奉敕撰,《明英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卷19,正統元年閏六月壬午條;同書,卷43,正統三年六月戊辰條;卷71,正統 五年九月己未條;同書,卷76,正統六年二月丁酉條;同書,卷209,景泰二年十 月丁亥條,頁379、840-841、1383-1384、1510-1513、4502-4503。

¹⁰³ 有關成化三年之役和成化十五年之役的背景和經過,參見園田一龜,《明代建州女直史研究(續篇)》(東京:東洋文庫,1953),頁 1-149;河內良弘,《明代女真史研究》,頁 459-492。

^{104 [}明]趙輔,〈平夷賦并序〉,收入[明]李輔纂修,[嘉靖]《全遼志》(北京:國家 圖書館出版社,2013),卷6,〈藝文下〉,頁380。

1500)的碑傳中提到他在成化十五年之役中領兵「出鴉鶻關,抵泊珠江」。¹⁰⁵然而,據筆者目力所及,明代文獻所載成化十五年以後的歷史事件中,再未出現婆豬江這個地名。至於明代方志中有關渾江的記載,則粗疏且缺乏更新。¹⁰⁶《遼東志》提到了鴨綠江及其支流的概況,稱「(鴨綠江)由夾州城西南流,與禿魯江合流,至艾州,與豬婆江同流入海」。¹⁰⁷所謂艾州,指朝鮮義州,絕非渾江與鴨綠江交匯之地。¹⁰⁸而「猪婆江」似是顛倒文字的錯誤表達。這段含混不確的表述在此後的《全遼志》和《四鎮三關志》中均未得到修正。¹⁰⁹有研究者懷疑《遼東志》的纂修者不了解婆豬江,是從朝鮮人那裡得知這條河流的。¹¹⁰事實上,光是朝鮮王朝時代的基本史料中就有大量提及婆豬江的記載,時間跨度也很長。由此可見,明朝官方總體上對渾江長期缺乏認知。婆豬江嚴格來說主要是朝鮮王朝使用的地名。

歷史記錄的長期空白使得橫江地名的確切起源成了一個謎。不過,萬曆 後期遼東巡按熊廷弼的勘界調查應是橫江地名得以廣泛傳佈,為人所知的重 要契機。正如前文所述,他不僅在題本中多次提到橫江,還在書信中屢次以 橫江指稱寬奠新疆。徐光啟等明末官僚士人對棄守寬奠新疆的認識都源自熊 氏。當然,這不意味著熊廷弼一定是橫江地名書面記錄形式的制定者。明朝

^{105 [}明]賀欽,《醫閣先生集》(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卷4,《明故鎮國 將軍遼東副總兵韓公墓誌銘),頁207;[明]費宏,《太保費文獻公摘稿》(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19,〈明故鎮國將軍遼東副總兵韓公神道碑銘〉,頁 651。

¹⁰⁶ 明朝官修地理志書對於鴨綠江、圖們江水系的記載相比前代沒有突破,基本處於停滯狀態。同時期的朝鮮王朝由於向北拓疆至鴨綠江、圖們江南岸,對兩江進行了深入的調查記錄,以確保其疆土利益。因此,當時朝鮮官修地理志書對於鴨綠江、圖們江地理情況的記載比較詳細。參見劉陽,〈明代中朝官修地理志書中的鴨綠江、圖們江地理認識〉,《史學史研究》,3(2017),頁 19-28。

^{108 「}艾州」即義州也。艾、義音相似,故漢人或稱艾州,又稱愛州。參見〔朝〕崔世 珎奉教撰集,《吏文輯覽》卷 3,收入末松保和編,《訓読吏文:附吏文輯覧》(東京:國書刊行會,1975),頁 348。

^{109 [}嘉靖]《全遼志》,卷1,〈山川志〉,頁121;[明]劉效祖撰,彭勇、崔繼來校注, 《四鎮三關志校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8),卷2,〈形勝考·遼鎮形勝・ 山川〉,頁58。

¹¹⁰ 劉陽,〈明代中朝官修地理志書中的鴨綠江、圖們江地理認識〉,頁 22。

開拓寬奠新疆時形成的文字材料可能已經記錄了一些地名信息,例如官府對 邊民告墾的批允和賦稅簿籍、111當地的碑刻等。112若再往前追溯,橫江地名的 直接來源應是在寬奠新疆謀生的明朝邊民。從地名形式上看,橫江與婆豬江、 佟家江均相去甚遠,沒有證據表明該地名的起源具有非漢語言的背景。筆者 還是認為,「橫」字的「橫亙」之義或許可以解釋橫江一名的含義。

本文第一節引述的那些具體例證表明,萬曆以後的晚明時期,橫江所在 的鴨綠江流域腹地是時人關注的一個焦點地區。要知道,在明朝的版圖格局 中,鴨綠江流域即便對於遼東鎮來說都只是東部邊僻之地,但在明末後金崛 起造成的遼東危局中,鴨綠江—橫江水系成為了溝通山海的重要孔道。晚明 官僚士人對橫江的重視正是基於其獨特的軍事地理價值。

然而,進入崇禎朝以後,東江鎮形勢的急轉直下使得紙上談兵的機會不復存在。隨著明朝失去在鴨綠江流域周邊地區的立足點,橫江開始淡出時人的視野。¹¹³崇禎二年(1629)六月毛文龍被殺以後,東江集團內亂不已,崇禎四年(1631)底,其增援大凌河前線的軍隊在北直隸吳橋叛變,最終以孔有德(1602?-1652)、耿仲明(?-1649)、尚可喜(1604-1676)等將領率部降金收場,致使東江鎮一蹶不振,坐困孤島。¹¹⁴後金(清朝)則抓住機會,自天聰七年(1633)五月至崇德三年(1638)三月陸續收降和攻滅了整個東江鎮。¹¹⁵清朝肅清遼東沿海的次月,皇太極(1592-1643)下令展界,但仍然設立封禁線,事實上開始

¹¹¹ 以上住民共六千八百餘家,計地約六百餘頃,俱係陸續告在撫按衙門,批道轉行各官查明詳允,每畝先納地價銀三分,方許開種,徵糧三千餘石,俱有庫收、倉收簿籍存証。參見〔明〕熊廷弼,《按遼疏稿》,卷2,〈勘覆地界疏〉,頁400。

¹¹² 遼寧省寬甸滿族自治縣大西岔鎮西江村的廟西溝山現存有一塊明萬曆二十七年 (1599)的龍泉寺碑,表明當地在晚明時曾有一座寺廟,其遺址南距鴨綠江五公里, 西距寬甸縣城超過五十公里。這塊石碑已經殘缺斷裂,文物普查工作者釋讀殘存的 碑文後發現,碑陽記錄了萬曆二十七年(1599)寬奠的官員和當地居民在「遼陽寬 甸東」共同出資創立龍泉寺的事情,碑陰羅列了捐款人名錄,另據當地村民介紹, 碑文中提到的「後門」是鴨綠江對岸一個朝鮮村鎮的古稱。參見王海、寧京鵬,〈寬 甸新發現明代石碑考證〉,《現代企業教育》,23 (2011),頁 225。

¹¹³ 晚到崇禎中葉,《皇明職方地圖》中的〈全遼邊圖〉仍然提到過橫江。不過,地圖一如方志,會因循承襲既有記載中的地理信息。該圖與萬曆末所刊《籌遼碩畫》中的〈遼東圖〉一致度很高。參見圖 1、圖 2。

¹¹⁴ 相關史事概況參見孫文良、李治亭、邱蓮梅,《明清戰爭史略》(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頁319-336。

¹¹⁵ 孫文良、李治亭、邱蓮梅,《明清戰爭史略》,頁 327-350。

修建柳條邊的東段部分,寬甸六堡一帶仍舊是各種生產活動的禁區。¹¹⁶此後, 清朝長期在柳條邊以東的鴨綠江流域實行封禁政策。¹¹⁷本文所述的橫江區域, 至此已被消解。

清朝的滿族統治者肯定熟悉地處龍興之地的渾江,但他們會用滿語「佟家烏喇」稱呼這條河流。¹¹⁸於是,入清以後,橫江這一特定的地名書面記錄形式,失去了通過文獻傳播延續的機會,未能在王朝國家的地理知識系統中扎根,被人們遺忘了。¹¹⁹

五、結論

本文考證內容可簡要小結如下:

- (一)晚明遼東東邊地帶的橫江就是今天的渾江。橫江別名橫河,後者在晚明時期還是遼東另一條河流渾河的別稱。
- (二)横江從河流名稱引申成為了區域名稱,與寬奠新疆這一地名概念高度 重合。晚明時人對橫江地區的認知表明,萬曆三十年代明朝棄守寬奠 新疆後,當地的邊民群體並未迅速瓦解,而是一直活躍到了萬曆末期。
- (三)横江地名流行於萬曆以後的晚明時期。明朝官方起初只是對朝鮮王朝

¹¹⁶ 高志超, 〈論後金時期的遷海〉, 《清史研究》, 1 (2016), 頁 71-72。

¹¹⁷ 張傑,〈清前期對鴨綠江封禁區的管轄〉,《中國邊疆史地研究》,4(2004),頁 52-61。

¹¹⁸ 参見圖 4、圖 5。其他清代官修漢文典籍也偶有這樣表述的。《大清會典》載:「(康熙)二十二年,議準:盛京佟家烏喇地方所産大木,有願採伐貿易者,聽工部、盛京工部、寧古塔將軍發給執照,令沿海運至天津貿易,不許夾帶禁物、竊捕貂鼠、私採人參。」見[清]伊桑阿等奉敕纂修,[康熙]《大清會典》(臺北:文海出版社,1992),卷 132,〈工部二・營造二〉,「物料・木植」,頁 6582;《康熙起居注》載:「(初九日辛巳)又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詹事、科、道會議佟佳烏喇、朝鮮等處人於海岸貿易木植事。一議俱准貿易,一議朝鮮不准貿易。」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整理,《康熙起居注》(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 14,康熙二十二年四月,頁985-986。

¹¹⁹ 筆者目力所及,除了前文所引談遷(1594-1658)《國權》提過橫江,另見毛奇齡(1623-1713)在〈毛總戎墓誌銘〉中有「溯鴨綠以指黃〔橫〕江」的記載。參見〔清〕毛奇齡,〈毛總戎墓誌銘〉,收入〔清〕吳騫輯,《東江遺事》(成都:巴蜀書社,1993),卷下,頁451。但這都屬於對明末歷史的記述,不是橫江地名在清初依舊被使用的證據。

使用的婆豬江地名有些許了解,成化至萬曆這段期間則是對渾江缺乏 認知。萬曆後期文獻記載中開始出現的橫江地名很可能源自寬奠新疆 的邊民。明末遼東戰事爆發,不少明朝官僚士人看重鴨綠江—橫江水 系溝通山海的軍事地理價值。隨著明清鼎革,以及這一過程中邊疆軍 事人群的瓦解,流域的封禁,本就流傳時間不長的橫江失去了穩固為 官方地名的機會,從書面記錄中消失了。

> 本文於 2022 年 8 月 31 日收稿; 2023 年 3 月 6 日通過刊登 責任校對: 江昱緯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朝〕春秋館撰,《朝鮮仁祖大王實錄》,首爾: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1931,據太 白山史庫本影印。
- [朝]春秋館撰,《朝鮮世宗大王實錄》,首爾: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1930,據太 白山史庫本影印。
- 〔朝〕春秋館撰,《朝鮮世祖大王實錄》,首爾: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1930,據太 白山史庫本影印。
- 〔朝〕春秋館撰,《朝鮮宣祖大王實錄》,首爾: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1931,據太 白山史庫本影印。
- 〔朝〕春秋館撰,鼎足山本《光海君日記》,首爾: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1933, 據鼎足山史庫本影印。
- 〔朝〕春秋館撰,太白山本《光海君日記》,首爾: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1931, 據太白山史庫本影印。
- 〔朝〕崔晛,《訒齋先生文集》,收入《韓國歷代文集叢書》,冊 930-933,首爾:景仁 文化社,1999。
- 〔朝〕丁若鏞,《與猶堂全書》,收入《亞細亞歷代文集叢書》,冊 3267-3300,新北: 漢棠文書股份有限公司,2017。
- 〔朝〕李民寏,《柵中日錄》,收入潘喆、李鴻彬、孫方明編,《清入關前史料選輯》, 輯 3,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
- [朝]李民寏,《紫巖先生文集》,收入《亞細亞歷代文集叢書》,冊 3016,新北:漢 棠文書股份有限公司,2017。

- [朝]李廷龜,《月沙先生文集》,收入《韓國歷代文集叢書》,冊 235-240,首爾:景 仁文化社,1999。
- [朝]李瀷,《星湖先生文集》,收入《韓國歷代文集叢書》,冊 267-273,首爾:景仁文化社,1999。
- [朝]盧思慎、徐居正等編纂,李荇等增修,《東國輿地勝覽》,收入《朝鮮群書大系》, 冊 29-33,揚州:廣陵書社,2019,據明治四十五年(1912)至大正元年(1912) 刊本影印。
- 〔明〕陳文等奉敕撰,《明英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據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紅格鈔本影印。
- [明]顧秉謙等奉敕撰,《明神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據國立北平圖書館藏紅格鈔本影印。
- [明] 溫體仁等奉敕撰,《明熹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據國立北平圖書館藏紅格鈔本影印。
- [明]《海運紀事》,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冊 56,北京:書目文獻出版 社,1996,據明刻本影印。
- 〔明〕《萬曆邸鈔》,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1,據 1968 年正中書局影印國 立中央圖書館藏本影印。
- 〔明〕方孔炤,《全邊略記》,收入《四庫禁毀書叢刊》,史部冊 11,北京:北京出版 社,2000,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影印。
- [明]王在晉,《三朝遼事實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43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上海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影印。
- [明]李輔纂修,[嘉靖]《全遼志》,收入《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冊 335,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據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刻本影印。
- [明]汪汝淳,《毛大將軍海上情形》,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江戶初 年寫本。
- 〔明〕沈國元,《兩朝從信錄》,收入《四庫禁毀書叢刊》,史部冊 29-30,北京:北京 出版社,2000,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末刻本影印。
- 〔明〕茅元儀,《武備志》,收入《中國兵書集成》,冊 27-36,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瀋陽:遼瀋書社,1989,據明天啟刻本影印。

·110·馬 驥 明代研究 第四十期

[明]茅瑞徵,《東夷考略》,收入《玄覽堂叢書》,冊 94-95,上海:上海精華印刷公司,1941,據明天啟元年(1621)浣花居自刻本影印。

- [明]徐光啟,《徐氏庖言》,巴黎: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明刻本。
- [明]張溥,《七錄齋集六卷論略一卷》,收入《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冊 182,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吳門童潤吾刻本影印。
- 〔明〕張萱,《西園聞見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1168-1170,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2002,據民國二十九年(1940)哈佛燕京學社印本影印。
- 〔明〕張鼐,《遼夷略》,收入《玄覽堂叢書》,冊 104,上海:上海精華印刷公司, 1941,據清陳氏裛露軒抄本影印。
- 〔明〕張鼐,《寶日堂初集》,收入《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 76-77,北京:北京出版 社,2000,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明崇禎二年(1629)刻本影印。
- [明] 畢恭等修,任洛等重修,[嘉靖]《遼東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646,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天津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影印。
- [明] 陳仁錫,《陳太史無夢園初集》,收入《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冊 59-60,北京: 北京出版社,2000,據山東省圖書館藏明崇禎六年(1633)張一鳴刻本影印。
- 〔明〕陳組綬,《皇明職方地圖》,巴黎: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藏,崇禎八(1635)至 九年(1636)長安舫齋刻本。
- [明]陸人龍,《遼海丹忠錄》,收入《古本小說叢刊·第七輯》,冊 4,北京:中華書局,1990,據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明崇禎翠娛閣刊本影印。
- [明]程開祜輯,《籌遼碩畫》,收入《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叢書,第一集》,冊 15-58,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據明萬曆刻本影印。
- [明]費宏,《太保費文獻公摘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133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吳遵之刻本影印。
- [明]賀欽,《醫閻先生集》,收入《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冊 720,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據明嘉靖九年(1530)成文刻本影印。
- 〔明〕黃道周,《博物典匯》,收入《故宮珍本叢刊》,冊 503,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0,據明崇禎八年(1635)刻本影印。
- 〔明〕熊廷弼,《按遼疏稿》,收入《四庫禁毀書叢刊》,史部冊 9,北京:北京出版 社,2000,據天津圖書館藏明刻本影印。

- [明]熊廷弼,《經略熊先生全集》,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末廣陵汪修能重刊本。
- [明]熊廷弼,《熊襄愍公集》,收入《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明代善本別集 叢刊》,冊 31-33,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據清嘉慶十七年(1812) 刻本影印。
- [明]熊廷弼,《遼中書牘》,收入《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冊 122,北京:北京出版 社,2000,據中國科學院藏明萬曆三十九年(1611)刻本影印。
- 〔明〕劉若愚著,馮寶琳點校,《酌中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
- 〔明〕劉效祖撰,彭勇、崔繼來校注,《四鎮三關志校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8。
- 〔明〕談遷著,張宗祥點校,《國権》,北京:古籍出版社,1958。
- [明]顧養謙,《冲菴顧先生撫遼奏議》,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冊 62,濟南:齊魯書社,1996,據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影印。
- [清]伊桑阿等奉敕纂修,[康熙]《大清會典》,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冊711-730,臺北:文海出版社,1992,據康熙二十九年(1690)內府刻本影印。
- [清]托津等奉敕纂,[嘉慶]《欽定大清會典》,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冊 631-640,臺北:文海出版社,1991,據清嘉慶二十三年(1818)武英殿刊本 影印。
- [清]托津等奉敕纂,[嘉慶]《欽定大清會典圖》,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冊 701-710,臺北:文海出版社,1992,據清嘉慶十六年(1811)內府刻本影 印。
- [清]吳騫輯、《東江遺事》、收入《中國野史集成》、冊 28、成都:巴蜀書社、1993、 據《明季遼事叢刊》本影印。
- 〔清〕汪楫等輯,《崇禎長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舊鈔本影印。
- [清] 昆岡等奉敕纂, [光緒] 《欽定大清會典圖》, 收入《續修四庫全書》, 冊 795-797,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據清光緒石印本影印。
- 〔清〕阿桂、于敏中等奉敕撰,《欽定滿洲源流考》,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冊 499,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清]阿桂、劉謹之等奉敕撰,[乾隆]《欽定盛京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

·112·馬 驥 明代研究 第四十期

書》,冊 501-503,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清〕張岱,《石匱書》,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318-32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2002,據南京圖書館藏稿本補配上海圖書館藏清抄本影印。
- [清]馮達道纂修,《重修河東運司志》,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冊 22, 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6,據清康熙十一年(1672)刻本影印。
- 〔清〕楊守敬,《晦明軒稿》,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冊 688,臺北:文海出版社,1979,據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楊氏鄰蘇園刻本影印。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整理,《康熙起居注》,北京:中華書局,1984。
- 末松保和編,《訓読吏文:附吏文輯覧》,東京:國書刊行會,1975。
- 陸地測量部,《満洲十万分一図》,日本:大日本帝国陸地測量部,昭和8-14年(1933-
 - 1939),Trove: https://nla.gov.au/nla.obj-234599123/view,擷取日期: 2023.2.22。
- 葉覺邁修,陳伯陶纂,[民國]《東莞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號 52,臺北:成 文出版社,1967,據民國十年(1921)鉛印本影印。
- 賈乃謙點校,《東江疏揭塘報節抄(外二種)》,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 劉澤民總主編,李玉民執行總主編,張培蓮本卷主編,《三晉石刻大全·鹽湖區卷》, 太原:三晉出版社,2010。

二、近人論著

- 三軍大學編著,《中國歷代戰爭史》,冊15,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9。
- 不著撰人、〈引用書目解說〉,收入白鳥庫吉監修,箭內亙、稻葉岩吉、松井等撰、《滿 洲歷史地理》,卷1,東京: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1913,頁1-57。
- 王明恩主編,張其卓執行主編兼撰述,《丹東滿族史略》,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 2006。
- 王海、寧京鵬,〈寬甸新發現明代石碑考證〉,《現代企業教育》,23(2011),頁 225-226。
- 王從安,〈桓仁縣境最大的古戰場——細說薩爾滸大戰的東線之戰〉,《滿族研究》, 3(2001),頁 47-52。
- 王從安、關惠喜、王俊輝、張士海、〈棟鄂城遺址研究〉,收入孫誠、張德玉主編、《建

州女真暨董鄂部研究》,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6,頁178-184。

白洪希,《清入關前都城研究》,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2007。

白新良,〈薩爾滸之戰與朝鮮出兵〉,《清史研究》,3(1997),頁9-15。

朱誠如、白文煜主編,《清朝前史》,大連:遼寧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

朱道清,《中國水系大辭典》,青島:青島出版社,1993。

佟冬主編,《中國東北史》,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

李健才,《明代東北》,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

沈載權,《『咨文』을 통한 朝鮮과 明의 中江開市 開設과 革罷과정 분석〉,《古文書研究》,45(2014),頁159-183。

肖立軍,《明代省鎮營兵制與地方秩序》,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

辛德勇,〈由清華大學藏戰國竹書《越公其事》談及春秋末期吴國的都城與《禹貢》 三江問題〉,收入彭林主編,《中國經學》,輯 27,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20,頁 135-145。

和田清,《東亞史研究(滿洲篇)》,東京:東洋文庫,1955。

河内良弘著,趙令志、史可非譯,《明代女真史研究》,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15。 邸富生、盧驊,〈略論明代萬曆年間寬奠六堡的移建〉,收入吉林省東北史研究會編,

《東北史研究》,輯 1,長春:吉林省東北史研究會,1983,頁 98-104。

姜大鵬,〈明代女真者皮船考〉,收入遼寧省博物館、遼寧省遼金契丹女真史研究會編,《遼金歷史與考古》,輯8,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18,頁190-198。

胡鴻、〈江到東北——古代東亞世界文化交流之一例〉,收入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編, 羅豐主編、《絲綢之路上的考古、宗教與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頁

90-101 •

孫文良、李治亭、邱蓮梅,《明清戰爭史略》,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

孫祖繩,〈明代之寬甸六堡與遼東邊患〉,《東北集刊》,3(1942),頁 1a-29a、1a-1b、 1a。

高志超、〈論後金時期的遷海〉、《清史研究》、1(2016)、頁63-72。

高艷林、〈明代萬曆時期中朝「中江關市」設罷之始末〉、《中國歷史文物》、2(2006)、 百38-43。

張永增口述,張吉滿筆錄,〈我所知道的渾江水運〉,收入通化市政協文史學習委員會

編,《東邊道經濟開發史略》,通化:通化市政協文史學習委員會,1998,頁 351-355。

- 張其卓,〈大清王朝發祥勝地丹東史話〉,《丹東日報》,2015 年 11 月 6 日,第 W02 版。
- 張其卓,《丹東建州女真史》,瀋陽:瀋陽出版社,2017。
- 張傑、〈清前期對鴨綠江封禁區的管轄〉、《中國邊疆史地研究》、4(2004)、頁 52-61。
- 曹文奇,〈薩爾滸之戰東路軍古戰場考察〉,收入曹文奇主編,《新賓清前史研究論 叢》,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3,頁 76-85。
- 陳涴,〈努爾哈赤的福星和恩人——李成梁〉,收入顧奎相、楊路平主編,《遼海講壇》,輯5,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9,頁133-167。
- 陳涵韜,《東江事略——毛文龍生平事跡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
- 陸戦史研究普及會編,《明と清の決戦:中國古戦史》,東京:原書房,1967。
- 園田一龜,《明代建州女直史研究(續篇)》,東京:東洋文庫,1953。
- 劉彥紅,〈本溪境內明代六大邊堡之——孤山新堡創築始末〉,收入遼寧省博物館編, 《遼寧省博物館館刊(2010)》,瀋陽:遼海出版社,2010,頁 178-183。
- 劉陽,〈明代中朝官修地理志書中的鴨綠江、圖們江地理認識〉,《史學史研究》,3 (2017),頁19-28。
- 劉緯、〈張其哈喇甸子〉,收入張傑貴主編,政協本溪滿族自治縣委員會編,《女真崛 起與本溪縣》,本溪:政協本溪滿族自治縣委員會,2015,頁 60-63。
- 稻葉君山,《清朝全史》,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社,1914。
- 稻葉岩吉,〈明代遼東の邊牆〉,收入白鳥庫吉監修,箭内亙、稻葉岩吉、松井等撰,

《滿洲歷史地理》,卷 2,東京: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1913,頁 460-546。

- 稻葉岩吉、〈建州女直の原地及び遷住地〉、收入白鳥庫吉監修、箭內亙、稻葉岩吉、 松井等撰、《滿洲歷史地理》、卷 2、東京: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1913、頁 547-576。
- 稻葉岩吉、〈清初の疆域〉、收入白鳥庫吉監修、箭内亙、稻葉岩吉、松井等撰、東京: 《満洲歴史地理》、券2、南満洲鐵道株式會社、1913、頁577-651。
- 稻葉岩吉,《光海君時代の滿鮮關係》,首爾:大阪屋號書店,1933。
- 鄭誠、〈西學出版與東江貿易——明末徽商汪汝淳事跡補考〉,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古

代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編,《明史研究論叢》,輯 19,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頁 180-193。

- 遼寧省文物局編著,《遼寧省明長城資源調查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
- 叢佩遠,〈鎮守遼東總兵李成梁〉,收入董玉瑛、叢佩遠主編,《東北歷史名人傳(古代卷)》,下冊,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頁128-145。
-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
- 顧克勇、〈《遼海丹忠錄》的材料來源及創作特色〉,收入廖可斌主編,《2006 明代文學 論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頁 560-570。

三、網路資料

- 조선왕조실록 (朝鮮王朝實錄): https://sillok.history.go.kr/main/main.do。
- Der Jesuiten-Atlas der Kanghsi-Zeit: China und die Aussenlaender, "Mukden", Library of Congress: https://www.loc.gov/resource/g7820m.gct00265/, 擷 取 日 期: 2022.12.1。
- "Qianlong 1766",QING MAPS:https://qingmaps.org/maps/qianlong-1766,擷取日期: 2022.12.1。
- 王曉明(微博 ID:軍事歷史地圖),《明代遼東軍事地理圖》(2018),「軍事歷史地圖」 微博主頁:https://weibo.com/2787626063/Geuccjmw9#comment,擷取日期: 2022.12.12。
- 淘寶店鋪漢宸文化,【裝飾畫訂制 全國包郵】明代遼東軍事地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6.798e352emHnoe6&id=5689 19062551&ns=1&abbucket=16#detail,擷取日期:2022.12.12。

・116・馬 驥 明代研究 第四十期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Name "Hengjiang" in Late Ming Liaodong

Ma, Ji*

The Japanese scholar Inaba Iwakichi was the first to point out that,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the Hun River, a tributary of the Yalu River, had been called Hengjiang, but this view had not been independently confirmed. After combing through and analyzing Xiong Tingbi's "Kanfu Dijie Shu," "Zhuangqi Tenglu," and other documents, it can be verified that this view is indeed correct. Hengiang was further extended from a river name to a regional name. Up until the Chenghua reign (1465-1487), the Ming officials were only vaguely familiar with the name Pajeogang used by the Choson dynasty (1392-1919) to address the Hun River, but from that time onward, they had little awareness of the Hun River. However, Xiong Tingbi's survey of the national boundary in Liaodong carried out during the thirty-sixth and thirty-seventh years of the Wanli reign (1608, 1609) made it widespread. After the Liaodong War broke out in the late Ming, many officials and scholars attached importance to the military geographic value of the name Hengjiang and its river and territory. However, with the fall of the Ming and the rise of the Qing dynasty, as well as the collapse of the frontier people and the closure of the watershed basin in this historical process, the name Hengjiang lost the opportunity to become an official place name and its use was discontinued.

Keywords: Kuandian, Choson Dynasty, Hengjiang, Hun River, Yalu River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History, Zhu hai, Sun Yat-sen University.